

# 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專號：明清思想史

---

5

2015 年 9 月

## 思想史第5期編輯委員

呂妙芬 Miaw-fen Lu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沙培德 Peter Zarrow	康乃狄克大學歷史學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陳正國(主編) Jeng-guo Che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黃克武 Ko-wu Huang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蕭高彥 Carl K. Y. Shaw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 編輯顧問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	David Armitage	Harvard University
余英時	普林斯頓大學	Peter K. Bol	Harvard University
村田雄二郎	東京大學	Benjamin El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林毓生	威斯康辛大學	Knud Haakonssen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張 灝	香港科技大學	Jonathan Israe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Princeton
陳弱水	國立臺灣大學		
黃進興	中央研究院	Nicholas Phillips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葛兆光	復旦大學		
羅志田	四川大學/北京大學		

(依姓名筆劃排序)

## 目錄

### 【論著】

王昌偉 王心敬續《關學編》與康乾之際關中理學傳統的建構： 兼論清代學術的區域化進程 .....	1
劉 勇 晚明理學「止修」學派之宗旨與師承 .....	39
張藝曦 明代陽明畫像的流傳及其作用——兼及清代的發展 .....	95
Ying Zhang (張穎) Confucian Principl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a Scandal: Writing about Zheng Ma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	157
Harry T. Dickinson Later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Changing British Interpretations from 1815 to the Present .....	215

### 【論壇】

金觀濤、劉青峰、邱偉雲 〈《新青年》的數位人文研究〉 .....	283
David Der-wei Wang Talks at “New Reflections on <i>New Youth</i> : Liberalism and Radicalism in Modern China” .....	311
Yoshizawa Seichio Political Ideals of <i>New Youth</i> : Chen Duxiu and Republicanism .....	321
Jeu Jenq Yuann Scientific Life View: Personal or Human .....	333

515冊。

羅大紘，《紫原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4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影印明末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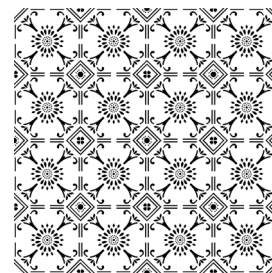
羅汝芳著，方祖猷等點校，《羅汝芳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Hymes, Robert. "Getting the Words Right: Speech, Vernacular Language, and Classical Language in Song Neo-Confucian 'Records of Word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宋遼金元》), 36(2006), pp.25-55.

Wilson, Thomas A.. *Genealogy of the Way: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s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論著】

## 明代陽明畫像的流傳及其作用—— 兼及清代的發展\*



張藝曦

台灣台中人，任職新竹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現居台北。曾著《孤寂的山城：悠悠百年金瓜石》（2007）、《社群、家族與陽明學的鄉里實踐：以江西安福、吉水兩縣為例》（2007）。目前進行的課題是「心學、文學復古與制藝文社：明末清初江西社集活動」。

\* 本文寫作期間，承蒙楊儒賓教授慷慨賜贈陽明像圖檔。林勝彩兄幫忙查對及校訂文稿。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明代陽明畫像的流傳及其作用——兼及清代的發展

### 摘要

本文主要處理兩個主題，一是陽明畫像在明代的流行，以及士人對這些畫像的評論，一是人們拜畫像的行為，以及拜畫像所反映的一些現象。由於士人收藏某畫像於齋中，個人或其小群體對畫像予以題詠，或在日常生活間敬祀崇拜，這類個人性的行為常富含特殊意義，所以本文以這類在私人空間中的畫像為主展開討論。時間斷限則集中在心學流行的明中晚期至這清初的這段時間。由於清中期曾有理學的復興，而與畫像對越或崇敬的現象也隨之而興，所以最後一節略及入清以後士人如何看待陽明畫像，以及清中葉的一些變化。

**關鍵詞：**陽明畫像、孔子像、聖人、王守仁、蔡世新

### 前言

本文主要處理兩個主題，一是陽明（王守仁，1472-1529）畫像在明代的流行，以及士人對這些畫像的評論，一是人們拜畫像的行為，以及拜畫像所反映的一些現象。

明中晚期陽明學的流行，講學活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有其侷限，儘管一些大儒的講學常可吸引數百人甚至數千人的參與，盛況空前，不過人數依然有限。參與講學的人各自回到鄉里及家族後，雖也可以透過在地講學或與人交流而發揮影響力，但陽明學所講究的是對心性的徹悟，這些聽講後的小讀書人所作的二手傳播，畢竟不如大儒親身講授來得有效。也因此，除了講學以外，還須有《傳習錄》等書以助流傳，在陽明學最盛的明中晚期，包括《傳習錄》、古本《大學》，以及大儒語錄或文集的刊刻與流通，使得一些沒有機會親聆大儒聲教的士人，仍可披覽這類書籍而接觸其學。<sup>1</sup>相對於此，較少人注意到塑畫像作為聖人形象具體化，以及有強化人們對學術認同與歸屬的作用。理學家因對成聖的追求，致力符合聖人形象，使其塑畫像被賦予特別意義，人們不僅在書院或講會中掛立其像，即使在私人的空間中，也有人敬拜理學家畫像，其中以陽明畫像最常見。講學活動的舉行、《傳習錄》等書的流通，加上塑畫像（尤其是陽明畫像），可說是陽明學的三寶。

塑畫像的傳統由來已久，如聖賢圖像、孔子聖跡圖都廣為人知，<sup>2</sup>兩宋以來的程朱學者也有塑畫像，如弘治、正德年間的畫家郭詡

<sup>1</sup> 張藝曦，〈明中晚期古本《大學》與《傳習錄》的流傳及影響〉，《漢學研究》，24：1（臺北，2006），頁235-268。

<sup>2</sup> 目前的《聖蹟圖》最早版本是正統九年的刊本，見鄭振鐸，〈「聖蹟

(1456-1532)，便曾受江西豐城程朱學者楊廉（1452-1525）之託，作孔子及二程、朱熹（1130-1200）一聖三賢共四幅像，<sup>3</sup>其中〈文公先生像〉至今仍存。<sup>4</sup>郭詡所擅長不在人物畫像的寫真，所以他所作的人物形象是比較模糊而不精確的，如他也作周濂溪像以示王守仁，但王守仁所贈詩卻說——「郭生揮寫最超群，夢想形容恐未真」。<sup>5</sup>但此幅〈文公先生像〉，人物特徵十分明顯，應有所本。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宋朱熹〈尺牘〉冊前副頁有「宋徽國朱文公遺像」（圖一），作者不詳，或與郭詡同時代人之作，兩幅畫像頗相似，顯示當時應流行某樣式的朱熹像畫法。

所以明中晚期為陽明學者作像並非創舉罕例。陽明像跟一般聖賢像或理學家像間的差異所在，不在像的畫法或作法有何特殊處，而在於學術本身。陽明學較諸其他時代的儒學，應是精英色彩最淡，最接近基層社會的一支，由於更多觸及基層士人、布衣或庶民百姓，使陽明像發揮更大的作用，甚至帶有宗教化的色彩，例如有人敬祀崇拜陽明畫像，也有因扶乩見王守仁而作像的例子。（後詳）一如《傳習錄》之前雖已有《近思錄》，而《傳習錄》的作用更大且廣；兩宋程朱學者雖有講學活動，但跟陽明學者的講學相比，效果不可同日而語；同樣的，陽明像也因時代及學術性質，而跟過往的聖賢圖像或理學家像

圖」跋》，收錄於《中國古代版畫叢刊》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390-392。

3 楊廉，《楊文恪公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26，〈送清狂山人歸泰和序〉，頁8。

4 此幅畫像經過幾次拍賣，所以未能確定其收藏地，請見（明）郭詡，〈文公先生像軸〉，《傳統文化博客資料庫》，<http://www.bjdips.com/gwh/result.aspx?ID=GWH-27449>（2015/09/08）。

5 王守仁撰，吳光等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14，〈題郭詡濂溪圖〉，1066-1067。

發揮不同的意義。

儒學士人的塑畫像常置於孔廟、學宮等公共空間中供人崇祀，人們可藉敬拜塑畫像宣示其學術依歸，這在私人興建的書院尤其明顯，宋明兩代，程朱學或陽明學門人陸續在各地興建書院，而書院所崇祀的塑畫像，多可具體反映其學術宗主所在，如浙江天真書院崇祀王守仁，但程朱學者所興建如晚明東林書院，崇祀名單中便無任何跟陽明心學相關的人。<sup>6</sup>

塑畫像可讓人直接想像其聖賢形象，效果較諸書籍文字更為直接，而置於公共空間，接觸的人多，作用也大，但除非是像王艮（1483-1541）留下遊孔廟而有感發的記錄（王艮所見是木主而不是



圖一：無款，宋徽國朱文公遺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6 東林書院所崇祀的是木主而非塑畫像，但反映學術宗主的作用是類似的，見斐大中等修，秦緬業等纂，（光緒）《無錫金匱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21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6，頁16。及至今日，外雙溪錢穆故居仍可見朱熹的塑像，錢先生著作等身，既有《朱子新學案》，也有心學方面的論著，又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但據其書案所置的朱子像，便可知其學術歸屬所在。



像)，<sup>7</sup>否則充其量只能統計各地書院的塑畫像的數目多寡。加上這類塑畫像還涉及許多複雜的政治因素，包括禮制（如大禮議中改像為木主）、祠祀禮儀、官方權力的干涉或滲透，以及地方輿論或期待等，使我們很難確定塑畫像的影響大小。因此本文雖未忽略公共空間的像，但不以此為主進行討論。此外，書籍上也常見畫像附隨在文集卷首，或是如歷代聖賢畫像之類的版刻畫像，藉由摹寫或刊刻而大量流通，儘管也有人對此類畫像帶有崇敬之情的記載，<sup>8</sup>但直接相關的資料很少，所以本文未把版刻書籍的像列入討論中。

相對於此，士人收藏某畫像於齋中，個人或其小群體對畫像予以題詠，或在日常生活間敬祀崇拜，這類個人性的行為則富含特殊意義，所以本文便以這類在私人空間中的畫像為主展開討論。時間斷限集中在心學流行的明中晚期至清初的這段時間。由於清中期有理學的復興，而與畫像對越或崇敬的現象也隨之而興，所以最後一節略及入清以後士人如何看待陽明畫像，以及清中葉的一些變化。

本文使用的三個詞，稍有區別：理學家包含程朱陸王廣義的理學各學派士人；明中晚期心學家主要指江門心學與陽明心學士人；陽明學者則專指陽明心學的士人。

## 一、日常生活中的塑畫像

畫像的分類存在多種標準，有的按描繪對象而分，如聖賢像；有

<sup>7</sup> 王元鼎輯，《年譜》，收入《王心齋先生全集》（臺北：廣文書局，1979），卷1，頁2，「丁卯武宗正德二年二十五歲」條。

<sup>8</sup> 如吳訥在補注熊節（1199年進士）的《性理群書》時，便將原編的宋儒畫像的部份刪除不載，因其認為把聖賢畫有如真人臨在，而人與其宴處一室，並不適宜。

的按情節內容而分，如雅集圖；有的按表現形式分為頭像、半身像、整身像、單人像、群像等。單國強把畫像分作幾類：歷史人物像、帝王像、官僚縉紳像、文人名士像、庶民像、女性像、畫家自畫像，<sup>9</sup>若加上塑像，種類可能更多，難以在一篇文章中全部涉及。本文主題是心學家的像，所以此處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較容易接觸到的、跟儒學士人有關的地方先賢像及孔子像。

地方先賢像常見於當地的鄉賢祠或先賢的專祠等，一般是為當地的知名人物作的塑畫像，以供地方士民百姓瞻仰崇祀，如江西永新陽明學者劉朝璽去世後百姓爭相肖像祭祀：

劉朝璽，（永新）炎村石泉里人，世為禾川仕族。……公且為德于鄉，如議南兌半折，及社倉諸事，沒，使里人爭肖像祀公。<sup>10</sup>

也有個別士人收藏先賢像，如江西泰和王思（1481-1524），他是明初大學士王直（1379-1462）的曾孫，仰慕吉安當地先賢文天祥（1236-1283），所以不僅訪求文天祥遺像，而且在求得遺像後，出入奉像偕行。<sup>11</sup>

孔子像多藏於孔廟或地方學校，如北宋李公麟（1049-1106）的《宣聖及七十二賢贊》，儘管原作已失傳，但宋高宗按此圖及贊語刻

<sup>9</sup> 單國強，〈肖像畫類型芻議〉，《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北京，1990），頁11-23。

<sup>10</sup> 鄒元標，《鄒子存真集》（國家圖書館藏內閣文庫影印明天啓二年序刊本），卷7，〈大中大夫雲南參政致仕前兵科給事中侍經筵官念南劉公銘〉，頁82-84。

<sup>11</sup>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卷1，〈改齋文集序〉，頁47-48。

成石碑，立於杭州太學旁，至今仍保存在杭州的孔廟中。<sup>12</sup>在理學流行的年代，書院講學或講會舉行前，常有拜孔子像的儀式，如王守仁的大弟子鄒守益（1491-1562）在祁門的講會，會約便規定拜孔子像：

復定邑中之會，春秋在範山書屋，夏冬在全交館，相與拜

聖像，宣聖諭，勸善規過，以篤實輝光，共明斯學。<sup>13</sup>

聖像即孔子像。清初謝文游（1615-1681）講學時亦然，他把孔子畫像懸諸堂前率弟子參拜，而在無孔子像時，則書孔子名於紙幀上以代替，據載：

（康熙元年）夏五月，張令（按：南豐縣令張黼鑑）歸，

奉家傳元人所繪孔聖像，拜納程山曰：「此像唯先生得拜

之，黼鑑不敢私也。」先生拜受，懸諸尊洛堂前，設紙

帳，朔望及會講日，率弟子啓帳焚香四拜，乃登講席。先

是亦拜書紙燈耳。<sup>14</sup>

南豐知縣張黼鑑贈像的理由是：「此像唯先生得拜之」，顯示像還跟學術宗主或道統有關。（後詳）此像在謝文游臨終前傳予門人曾曰都，後懸於程山學舍。<sup>15</sup>張黼鑑所贈像來自家傳，可知孔子像除了置於公共空間，也在人手間流傳，如艾南英（1583-1646）家亦世藏孔子畫像。<sup>16</sup>

12 趙榆，〈孫悅漢及其收藏的宣聖及七十二賢贊圖卷〉，《收藏家》，2002年1期（北京，2002），頁49-51。

13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7，〈書祁門同志會約〉，頁21。

14 謝鳴謙輯，《程山謝明學先生年譜》，附於謝文游，《謝程山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9冊，「康熙元年條」，頁12。

15 包發鸞修，趙惟仁等纂，《民國南豐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58（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卷3，〈古蹟〉，頁40。

16 艾南英，《天慵子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72冊（北京：北

最常見的父母或祖先的塑畫像，有的擺在家族祠堂供族人敬拜，有的則在家中神龕供奉。前者如明初靖難之變死節的廬陵曾鳳韶（1374-1402）、曾子禎二人，在嘉靖年間政治忌諱漸淡後，曾氏子弟以士紳曾孔化為代表，積極尋訪二人畫像，據說所訪得兩幅畫像凜凜猶生，曾孔化一見之下，馬上哭拜在地，並提請地方官員創建二忠祠以祭拜之。<sup>17</sup>後者如有人把父母畫像編作一冊，隨身攜帶；程朱學者尹襄（1484-1526）的朋友柯信便有一本永感冊，冊中有其父母遺像，柯信出入攜以自隨，「庶幾吾親之在目而不敢忘」。<sup>18</sup>此外，民間常常流行一類故事，即孝子追思早逝的父母，而繪出父母畫像，又或者是人子未能得見父或母，但因夢而知其父或母之面貌形象，所繪畫像維妙維肖。如三吳陸氏的例子：

陸翁起三吳世家，少以博學雄文蜚英庠校，居常痛父蚤

世，追思不已，至援筆繪像，儼若生存，人以爲孝誠所

感。<sup>19</sup>

這類故事往往因敘述簡略而頗富戲劇化。涂伯昌（？-1650）的〈孤子夢記〉則詳載其曲折的過程，因頗有趣，節錄於下：

有幼失父者，夜夢其親，旦走告耆老曰：「夜夢吾父，吾

父鬚眉若是，衣冠若是。」曰：「是非汝父也，汝父鬚眉

若是，衣冠若是。」歸而假寐，復夢其親，與耆老之言無

京出版社，2005），卷10，〈家藏孔夫子像贊併序〉，頁1-2。

17 王慎中，《玩芳堂摘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88冊，卷2，〈曾氏二忠祠記〉，頁9-10。

18 尹襄，《巽峰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7冊，卷9，〈永感冊序〉，頁12。

19 曾同亨，《泉湖山房稿》（國家圖書館藏內閣文庫影印明刊本），卷20，〈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溪陸公偕配陳恭人合葬墓表〉，頁23。

異。告耆老曰：「吾昨又夢吾父，與耆老言同。非耆老言，吾幾不識父也。」耆老曰：「予言試汝也。汝前所夢者真也，汝後所夢者夢也。汝前所夢無因也，汝後所夢因吾也。」失父者涕泗交頤，皇皇不敢自信。……聞鄉之人，有畫父像者，展拜而形神俱爽，恍然見父也。氣稍定，神稍清，熟視之，先所夢者真也，後所夢者夢也。由是數夢其親，與先之夢無異。<sup>20</sup>

記中指出，孤子幼失其父，夢其親而走告當地耆老，形容夢中所見父親面貌與穿著，但耆老不僅故意否定，還另作一番形容，孤子受耆老的言語暗示，於是復夢其父，跟耆老所形容一致。待知耆老誑己後，孤子皇皇不能自信，所幸有人曾畫其父像，孤子見此像後，才終於肯定最初所夢的父親形象無誤。<sup>21</sup>

無論是學校、書院、鄉賢祠或父母祖宗的塑像畫，儒學士人都曾爭議是否應設像，及細節到「像」是否像或不像的問題。塑畫像流行於日常生活之中，相關討論自然不少，加上有時又涉及政治事件（如大禮議）而更形複雜，因此不應以二分法簡單區別贊成或反對設像兩邊。但程頤（1033-1107）反對設像的言論對時人及後世頗具影響

<sup>20</sup> 涂伯昌，《涂子一杯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3冊，卷4，〈孤子夢記〉，頁54。

<sup>21</sup> 人子常會持這類父祖畫像請人題像贊。湯來賀曾為王仲鳴作像贊，題曰：「聞君夙昔，孝友和平。親茲遺像，儼兮若生。子姓拜瞻，翼翼兢兢。致慙則著，視于無形。惟述追乎厥德，斯丕振乎家聲。」見湯來賀，《內省齋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9冊，卷28，〈王仲鳴像贊〉，頁11。著眼在子孫睹父祖遺像，不僅瞻拜，還能追惟德，丕振家聲。在此像贊末，謝文游作評曰：「為人子孫題祖父像贊，當以此種為式。」

力，應可代表當時的主流意見。據載程頤在跟學生討論祭禮時，強調禮以義起，所以富豪及士人願行祭禮者，可置影堂以祭，但不可用畫像，他的理由是：

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可方，若多一莖鬚，便是他人。<sup>22</sup>

儘管程頤未必禁絕塑畫像，但對塑畫像能否代表父母持保留的態度。相對於此，明中晚期不少陽明學者常把重點放在人子的孝心，畫像作為孝心具體投射的對象，如鄒德涵（1538-1581）說：「思親者肖其像而祀之，非祀夫像也，因像以志思耳矣。」<sup>23</sup>雖然沒有直接反對程頤之說，但所強調點已有不同。

上述的像，包括塑像、木像，以及畫像。塑像多半不常移動而固定在公共空間，而木像與畫像則可隨身攜帶，或置於私人處所。所以以下的討論將偏重在畫像與木像，尤其是以流傳最廣的陽明畫像為主進行討論。

## 二、理學家的聖人形象

士人文集或筆記資料中不乏關於個人畫像的記載，相關記載的數量與頻率隨著時代越後而增加，這應跟明中晚期常見士人與畫家交遊的現象有關，其中不乏理學之士與知名畫家往來的例子。如郭詡為林

<sup>22</sup> 程顥、程頤撰，潘富恩導讀，《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22上，〈伊川雜錄〉，頁341。明初宋濂也沿襲此說，表示——「人為物靈，其變態千萬，一毫不類，則他人矣。」宋濂，《宋學士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萬有文庫》本），卷37，〈贈傳神陳德顏序〉，頁644。

<sup>23</sup> 鄒德溥，《鄒泗山先生文集》（傅斯年圖書館藏安成紹恩堂刊本清刊本），卷2，〈畏聖錄序〉，頁7。



俊（1452-1527）畫像，林俊許為妙品，便推薦給邵寶（1460-1527）為其作像。<sup>24</sup>隨著肖像畫的技法持續有創新，到十七世紀即晚明左右，畫家對面部的描繪有突破性的發展，如活躍於南京、江南一帶的曾鯨（1568-1650），他透過「渲染數十層」「必分凹凸」的技法，使所描繪的人物面容更自然，所以許多人都委託他畫像，<sup>25</sup>於是類似與畫家交遊的例子更不少見。

理學家的塑畫像除了像與不像以外，還有道德理想的體現這層含義，簡言之即聖人形象。作聖是理學家修身的目標，也是其理想人格的完成，理學家對此事的關懷最深。兩宋程朱學與陽明心學各有其聖人觀，兩者雖承認聖人可為，但對成聖的標準卻有不同。兩宋程朱學的聖人觀的精英色彩較濃，在朱熹的口中筆下，聖人常被描寫成至高至善、難以企及的境界，一般人必須終其一生追求才有達成目標的可

24 數年後郭詡將成品寄予邵寶，邵寶雖覺不類己貌，然因頗似有道者之容，於是仍寶而藏之且作詩贊。見邵寶，《容春堂集》續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8，〈贊郭詡所寫小像〉，頁23：「見素先生嘗稱泰和郭詡寫照入妙品，予慕之，未見也，一日見於南昌東湖之上，予揖之數語而退。予去江西之八年，諸生思予，乃屬仁弘想像而筆焉，寄予京師，見者皆曰不類，予愛其有有道之容，未忍棄也，贊而藏之：諸生予懷，郭史予寫，貌豈予如，如古儒者，敬共朝夕，維予夙心，畫哉畫哉，以為予箴。」

25 鄧麗華，〈從曾鯨肖像畫看晚明文人士個人形象的建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1）。曾鯨似曾根據陽明門人的描述而作「陽明先生肖像」，見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9章，〈陽明之遺像——形象考〉，頁175。除了這些著名畫像以外，還有大量默默無聞的肖像畫家與民間畫工，他們往往數代畫像寫影，技法純熟，民間人家流傳的祖先畫像幾乎都是出自他們之手。這些民間畫工常用「傳神小稿」，作為為人家的子孫追摹祖先或父母畫像時，供其選擇近似形貌用的樣譜，見華人德，〈明清肖像畫略論〉，《藝術家》，218期（臺北，1993），頁236-245。

能，加上兩宋程朱學的格物窮理之說，必須窮盡天下之物之理才能一旦豁然貫通，更增作聖的難度，強化了聖人可望不可即的形象，因此兩宋程朱學者並不輕易許人為聖。

對程朱學的成聖標準，自陳獻章（1428-1500）已有異議，王守仁則有「滿街人都是聖人」<sup>26</sup>之說，很簡捷直接的表達聖人易為的觀點，上自賢人君子，下至愚夫愚婦，只須致其良知，便能作聖。尤其是成色分兩說，把原本高高在上的聖人形象，以堯、舜、周、孔這些遠古聖王跟一般的庶民百姓同等並列。即使堯舜周孔也只是致其良知，今人只須致其良知亦能作聖。

聖人易為說有其時代背景脈絡。陳獻章生前已被尊為「活孟子」，與亞聖孟子相提並論，<sup>27</sup>顯示程朱學的聖人難為說已有鬆動的跡象。隨著陽明心學的流行，聖人可為易為之說更加普及，如劉元卿（1544-1609）的族人劉本振僅是一般庶民，在復禮書院聽劉元卿說聖人可為，了解自己也可當聖人，遂踴躍而起，從此折節力學。<sup>28</sup>在此聖人易為的風氣下，甚至有人自許為聖，萬曆年間流傳的一則笑話生動的描寫了這股流風：一名狂生先許堯、舜、文王、孔子為聖人，但待數到孟子，卻遲疑良久不願屈第五指，以為孟子英氣太露，不免讓人懷疑未能優入聖域，於是——「旁有人拱立曰：宇宙間第五位聖

26 王守仁，《傳習錄》，《王文成公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國學基本叢書》本），第18冊，卷3，〈語錄三·傳習錄下〉，頁26：「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

27 胡直，《衡廬精舍藏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7冊，卷10，〈刻白沙先生文集序〉，頁2。

28 劉孔當撰，劉以城編，《劉喜聞先生集》（東京：高橋情報，1993），卷4，〈石鱗公傳〉，頁20。

人，莫非公平？遂下第五指，口不敢」。<sup>29</sup>

儘管有上述荒誕的故事，顯示當時人不再把聖人視為可為卻難及的境界，但我們仍可推想到，實際上應有許多人仍不自信己能成聖，也因此鄒守益的孫子鄒德涵（1571年進士）在年輕聲名未起時，在復古書院講學中，便因對聖人的見解而引起轟動，據其弟鄒德溥（1583進士）說：

伯兄起後進行，直任以聖人為必可學，則眾閤目為狂生。<sup>30</sup>

聖人可為是整個宋明理學最基本的概念，參與講學的又都是對理學有興趣的士人，竟因鄒德涵說聖人可為即目為狂生，頗不合理。推測「直任」二字，應即鄒德涵以己可成聖之意。從旁觀眾人目鄒德涵為狂生的反應看，顯示即使在萬曆年間陽明心學流行的高峰時，仍有不少人對自己能否成聖頗為猶豫。這也正可說明一個看似矛盾但又可兩存的現象：人們一方面相信聖人不僅可為而且易為，一方面又尊崇少數儒學士人尤其是心學家，視之為聖人或類似聖人的形象。

也因此，在王守仁生前與死後，門下弟子已有尊其為聖的意味，許多陽明學者反覆向世人宣稱，陽明學確是聖學無疑，<sup>31</sup>他們不把陽明學放到宋元以來的理學脈絡來理解，而是以王守仁承接孔聖嫡傳，與孔門弟子顏、曾等人並列，<sup>32</sup>他們雖未明言王守仁是聖人，但其實

<sup>29</sup> 劉元卿，《劉聘君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4冊，卷12，〈第五位聖人〉，頁78。

<sup>30</sup> 鄒德溥，〈伯兄汝海行狀〉，在鄒德涵，《鄒聚所先生外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7冊，頁94。

<sup>31</sup> 黃宗羲撰，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臺北：里仁書局，1987），〈師說·鄒守益東廓〉，頁8；卷13，〈浙中王門學案三·黃久菴先生館〉，頁280；卷18，〈江右王門學案三·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頁390、418。

<sup>32</sup> 呂妙芬，〈顏子之傳：一個為陽明學爭取正統的聲音〉，《漢學研究》，

已相去不遠。如羅大紘（1586年進士）稱王守仁為百世之師，<sup>33</sup>耿定向（1524-1596）則是仿《史記》〈孔子世家〉的體例而作〈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把王守仁與孔子、王門與孔門都等量齊觀了。<sup>34</sup>

不少陽明後學也被形容為聖人或類似聖人，如浙江紹興府的范瑾被百姓稱作「范聖人」。<sup>35</sup>如江右陽明學者，他們一方面透過舉行各式講學活動的舉行，向當地士民百姓傳講學術，一方面投身於社會福利事業，為地方興利除弊，而被當地士民百姓視為接近聖人般的人物，鄒守益即是顯例，<sup>36</sup>而在劉元卿死後，門人弟子為建「近聖館」以祭

15：1（臺北，1997），頁73-92。在陽明學者所編纂的地方志上，往往可見他們自許超越宋元諸儒而直接承接聖學嫡傳。如萬曆年間王時槐、劉元卿與羅大紘所主編的《吉安府志》，〈理學傳〉便只列陽明學者，而宋元明初的其他理學家則被歸入〈儒學傳〉中。相關研究見張藝曦，〈吉安府價值觀的轉變——以兩本府志為中心的分析〉，在氏著，《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附錄二〉，頁403-432。

<sup>33</sup> 羅大紘，《紫原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3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6，〈東撫臺王公〉，頁30。

<sup>34</sup> 耿定向，《耿天臺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1冊，卷13，〈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頁18-49。《四庫全書總目》已指出此點：「（耿）定向之學，歸宿在王守仁。故集中第十三卷以薛瑄諸人為列傳，而以守仁為世家。此蓋陰用《史記·孔子世家》之例，不但以守仁封新建伯也。」見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178，總頁1601。

<sup>35</sup> 「（范瑾）少從新建學，卓然以古聖賢自期，晚歲所造益深，……平居無戲言，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有司屢表其閭，立石里中，曰：范處士里。」見蕭良幹等修，張元忬等纂，（萬曆）《紹興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第520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43，〈鄉賢〉，頁32-33。

<sup>36</sup>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16冊，卷11，〈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追贈禮部侍郎諡文莊鄒東廓先生行狀〉，頁24。

祀，推崇之情之高不言可喻。對當地士民而言，鄒守益、劉元卿幾乎就是當世聖人。

### 三、明中晚期陽明畫像的製作與流傳

正是在前述脈絡下，陽明像不只是一般的人物像，還有其特殊意義，因此門人弟子後學除了在公共空間立塑畫像，也製作許多陽明畫像，這些畫像流傳於人手之間，甚至被當作日常敬拜的對象。因此本節的討論除了公共空間的像以外，主要以陽明畫像的製作及流傳為主。由於陽明心學發展之初，江門心學亦與其抗衡，雖迅速中衰，<sup>37</sup>而聲勢不如陽明心學，但仍有其影響力，所以也兼論江門心學學者的像。

公共空間的陽明塑畫像常被置於門人弟子所建的書院及舉行講會處，以王畿（1498-1583）在天真書院所塑像最著名：

（王畿）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于省，肖文成像其中，  
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門私淑，  
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于公取正焉。心喪  
畢，壬辰始赴廷對。<sup>38</sup>

關於天真書院的資料不少，我們很容易從其他資料得知此處是塑像而非畫像。天真書院是浙江陽明學的重鎮之一，所以許多人會前往此地講學並拜謁遺像。又如浙東周汝登（1547-1629）則是與友人結會，

<sup>37</sup> 潘振泰，〈明代江門心學的崛起與式微〉，《新史學》，7：2（臺北，1996），頁1-46。

<sup>38</sup>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34冊，卷51，〈浙江紹興府三〉，〈王畿〉，頁23。

祭告於當地奉祀王守仁的祠廟，此祠廟中便有陽明像：

己亥季秋，先生（按：周汝登）同石匱陶公及郡友數十人，共祭告陽明之祠，定為月會之期。<sup>39</sup>

也有崇奉木主的例子，<sup>40</sup>如河南尤時熙（1503-1580），屬於北方王門學派，他早年因讀《傳習錄》而有悟，於是崇奉王守仁神主於書齋中，士人來學時都須隨其展謁神主：

大指率祖文成，而得於體驗者為多。蓋自一見《傳習錄》，寢讀寢入，寢入寢透，齋中設文成位，晨起必焚香拜，來學者，必令展謁，其尊信若此。<sup>41</sup>

此間書齋應跟書屋的性質類似，既是私人讀書處，也是公開講學的場所。據此引文亦可附見《傳習錄》對當時人的影響。

根據錢明考察，目前現存於國內外的陽明畫像、木雕像及銅像，估計有40種以上。按時代與國別分，則可分為明清遺存塑畫像、日韓所藏像，及近人塑像三類。遺像的種類有燕居像、朝服像、封爵像、布衣像及戎裝像。<sup>42</sup>錢明在文中所舉的明清遺存塑畫像，以目前

<sup>39</sup>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65冊，卷4，〈越中會語〉，頁5-6。

<sup>40</sup> 當時拜神主者不乏其人，如東臺縣的吳愛、繆好信，也因慕王艮其人其學，也在家中奉祀其木主。見周右修，蔡復午等纂，（嘉慶）《東臺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60（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卷24，〈儒林〉，頁6-7。這條資料參考自呂妙芬，〈明清儒學關於個體不朽、死後想像、祭祀原理之論述〉，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主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臺北，2012），頁22。

<sup>41</sup> 張元忭，〈河南西川尤先生墓誌銘〉，在尤時熙，《擬學小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9冊，附錄卷上，頁30。

<sup>42</sup>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第9章，〈陽明之遺像——形象考〉，頁152-189。



現存的爲主，多半是塑像、石刻畫像，或是附見於族譜或文集卷首的畫像，明代單幅畫像仍存的不多，所以下文除了幾幅畫像的分析以外，也將輔以文字記錄的內容展開討論。

陽明畫像流傳雖多且廣，但著名畫師則數蔡世新一人。王守仁生前曾找許多畫師爲其作像，但因相貌特殊，所以始終沒有能夠讓王守仁點頭的作品，直到王守仁擔任南贛巡撫期間，有人介紹蔡世新給他，蔡當時只是一位無多大聲名的年輕畫師，卻畫出了讓王守仁滿意的像，據載：

王天成鎮虔，日以寫貌進者閱數十人，咸不稱意。蓋文成骨法稜峭，畫者皆正而寫之，顴鼻之間最難肖似。世新幼年隨其師進，乃從傍作一側相，立得其真。文成大喜，延之幕府，名以是起。<sup>43</sup>

蔡世新一畫成名。蔡世新所作的陽明畫像不少，在王守仁卒後，門人周汝員（1493-1558）在越中所建的新建伯祠，所用的就是蔡世新版本的像。<sup>44</sup>另據吳慶坻（1848-1924）所述，有一幅王守仁的燕居授書小像是蔡世新所作，小像上有葛曉的跋，跋語說：

先生像爲蔡世新所傳者極多，惟以多故，隨手輒肖，然至小者亦徑尺。<sup>45</sup>

<sup>43</sup> 朱謀㙔，《畫史會要》，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6冊，卷4，頁58。

<sup>44</sup>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35，〈附錄四·年譜附錄一〉，「嘉靖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條，頁48：「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員與知府湯紹恩拓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此祠應即前述萬曆年間周汝登及其友人共祭告的陽明祠。

<sup>45</sup> 吳慶坻撰，張文其、劉德麟點校，《蕉廊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7，〈王守仁燕居授書小像〉，頁200-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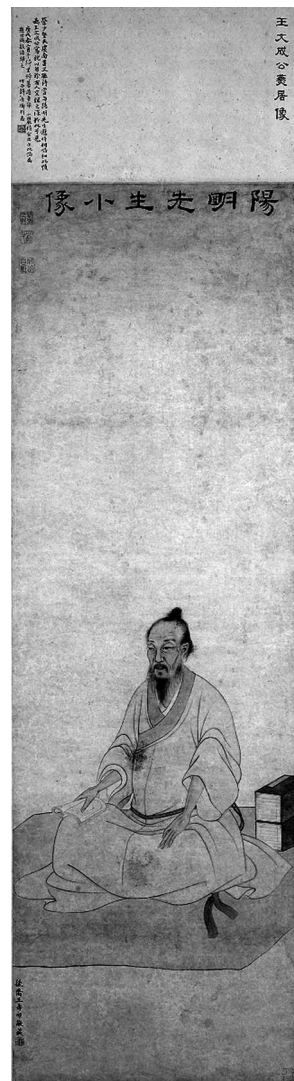


圖二局部

葛曉是浙江上虞人，應是晚明曾過手此畫的收藏家，且與陶望齡（1562-?）有過往來，<sup>46</sup>其言應可信。

蔡世新所繪的陽明像究竟形象若何呢？目前所存有兩件歸於其名下的作品：一爲上海博物館所藏的白描〈陽明先生小像〉（圖二），作四分之三側面像，畫中陽明先生束髮無帽，盤坐在大方巾上，右手持書靠於腿上，此書似爲身側兩函疊置書

<sup>46</sup> 在陶望齡的《歌菴集》中有與葛曉往來的書信，見陶望齡，《歌菴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65冊，〈答葛雲岳〉，卷12，頁30。



圖二：傳蔡世新，陽明先生小像，上海博物館藏。

冊的第一本，腰間所繫繩帶，其尾端結成兩穗，自衣擺間露出。描繪人物臉部的線條、衣褶與臂肘的呼應關係等處可見並非真正一流畫家的手筆，正反應著記載中蔡世新原本並非有名畫家的實況。其用筆尚屬敬謹，且對人物眼眶上部的輪廓、繩帶於衣袍中的壓疊轉折、書函中書冊的空缺等細節多有著墨，並非僅憑人物畫一般格套完成的畫作，或許真為蔡世新當日所見陽明先生燕居時的景象。畫幅雖未署款，但有「蔡世新印」、「少壑父」、「寫以自藏」三方印，應為傳世最可靠的蔡世新陽明像。「寫以自藏」印亦頗有趣，似乎代表了此畫為蔡世新私藏版本。畫幅玉池有清人許康衢題跋，應亦見此印文，故稱「蔡少壑氏，虔南畫史，能詩。嘗與陽明先生遊，時相唱和。此幀為王文成公寫貌以自珍。古人交誼之深，於此可見。」畫幅左下端另有「後裔王壽祁敬藏」的題識，可見此畫於蔡世新之後，亦曾為王陽明後裔所藏。另一件是《王陽明法書集》所錄，據載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今改名中國國家博物館），為正面設色本〈王陽明畫像〉（圖三），據說也是蔡世新所繪，此作人物面容亦有許多細節，例如上唇上方鬚鬚共分四段，鬚髮亦較豐盛，或許為王陽明較年輕時之相貌。惜尚未得見較清楚之圖像，究竟是否真蹟，尚難考訂。但似乎兩者皆為當時普遍獲得接受的王陽明形象。

與白描側面像類似的作品較多，也許正如《畫史會要》所記，是本自蔡世新得到王陽明認可的側面像之作。如上海博物館另藏的一本佚名〈大儒王陽明先生像〉（圖四），或是普林斯頓大學所藏的佚名〈王陽明像〉（圖五）、藏處不明的〈天泉坐月圖〉，<sup>47</sup>特別是鄒守益等

<sup>47</sup> 圖見〈傳〉曾鯨〈天泉坐月圖〉，Poly Auction 2010/01/23，拍品674號。該作與普林斯頓大學所藏〈王陽明像〉雖背景及家具有異，但陽明先生形象相似，皆著高冠端坐案前，或舉筆欲書，或持卷審閱，或許曾為陽



圖三：無款，王陽明畫像，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四局部



圖四：無款，大儒王陽明先生像，上海博物館藏。





圖五：無款，王陽明像，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藏。

人編纂的《王陽明先生圖譜》<sup>48</sup>中大部分的亦均為此類側面像。作為王守仁幾大弟子之一的鄒守益，採用的應是王陽明認同的圖像。因此，此圖譜雖是較簡略的刊本，但對於我們了解陽明學興盛時期流行的王守仁形象，有極大的助益。《王陽明先生圖譜》中亦有少部分使用如設色本般的全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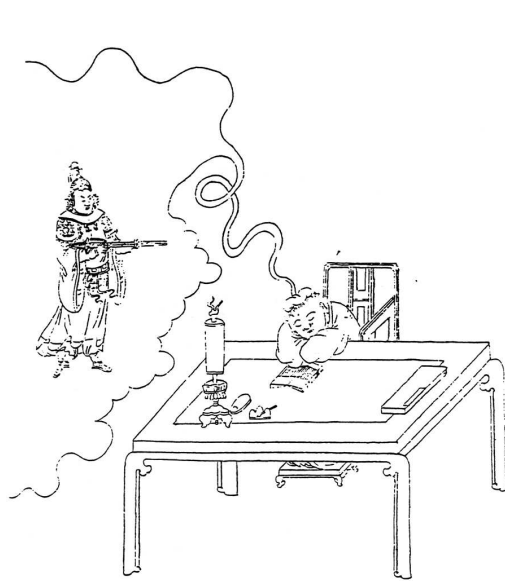
圖五局部

明畫像的一種方便「應用」的模式。如後文提及之蔡懋德之子摹寫的「侍親問道圖」，亦不無可能以此模式繪製。曾鯨很可能亦描繪過陽明像，傳稱作品筆者已知兩例，除上述〈天泉坐月圖〉，拍賣另有標為崇禎三年（1630）曾鯨款的高冠側面半身像。

<sup>48</sup> 鄒守益的《王陽明先生圖譜》分別收錄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4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及《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四輯第1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面形象。因此應可推測當時此類正面像亦有獲得弟子認同的版本，或者亦如現存題名所示，亦出自蔡世新之手。

《王陽明先生圖譜》展現了門人弟子頗執著於上述兩種圖像類型。圖譜中自其22歲開始的王守仁面目便與晚年形貌無甚差異（圖六、七）——除了面容消瘦、顴骨突出外，嘴唇上下以及兩頰下緣均蓄鬚。受託為此圖譜繪製其一生行誼圖像的畫家，無論是否是蔡世新，應都被要求不可妄自想像王守仁的容貌，因此可說自其「成年」之後，都一體應用「已獲認證」的王陽明像。我們若是考慮到《畫史會要》描述王守仁講究己之肖像，曾有數十人為其寫像，都無法得到王守仁的認可事，則得其認可的蔡世新，應可靠廣大徒眾對陽明像的



圖六：《王陽明先生圖譜》中王守仁15歲像。



圖七：《王陽明先生圖譜》中王守仁28歲像。

需求而擁有相當可靠的市場。相對於此，《聖賢像傳》所收的王陽明像，其五官與其他聖賢如出一轍，服飾姿態也多雷同。對比此類不重賦予人物獨特性的像傳，無論是蔡世新或《王陽明先生圖譜》所針對的群眾，似乎亟欲見到王陽明確切的長相，並因見到其形貌而感到快慰。茅坤（1512-1601）的這則故事，便可放到這個脈絡下理解：

陽明先生沒，而四海之門生故吏，及嘗提兵所過州縣蠻夷之廬，爭像而事之，當是時，陽明先生之像遍天下，而豫章間所傳特甚。予還金陵，一日，考功何君吉陽刺其所為像者過予，且曰即豫章間所善像陽明先生而名者也。<sup>49</sup>

善像陽明先生而名者指蔡世新，此段文字的前半段所指的像，可能是塑像或畫像，但後半段的遍天下之像，既牽涉到流傳，加上此文是茅坤為蔡世新所作序，所以應指畫像而言。何吉陽即何遷（1501-1574），湛若水（1466-1560）的門人，但頗親近陽明學，他跟茅坤在南京的相遇，應是嘉靖37年前幾年事，<sup>50</sup>而嘉靖朝正是陽明學從初興到極盛的時期，所以隨其門人弟子廣佈，畫像流傳也隨之遍天下。蔡世新憑藉為王守仁畫像而與陽明學者往來，並得其讚譽引薦而聞名。在宴席上，茅坤請蔡世新即席揮毫作畫，蔡世新頃刻即就，人皆能識其所畫是王守仁像。<sup>51</sup>茅坤好陽明學，常以未得見其冠裳容貌為恨，

49 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44冊，卷11，〈贈畫像者蔡少壑序〉，頁4。

50 何遷晚年任南京刑部侍郎，在嘉靖37年（1558）任滿後前往北京，故知是此年的前幾年事，見黃宗義撰，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27，〈南中王門學案三·文貞徐存齋先生階〉，頁618。

51 「予間攜之，出示所嘗共先生遊者，或覆其半，露其半，即能按識而呼曰：此某先生也。」見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卷11，〈贈畫像者蔡少壑序〉，頁4。

如今得見其畫像，他說：

予嘗慕先生與其門弟子誦說其道，往往以不及從之遊，觀其所為冠裳容貌為恨，今適得依先生之像類甚者，存而禮謁之，幸矣哉。<sup>52</sup>

既是「存而禮謁之」，顯示不是簡單看過像而已，還有崇敬禮謁之意。茅坤同時指出，門人弟子不應只是禮謁畫像，還應遵行陽明之道。畫者苦心孤詣方才得陽明像之神，門人弟子不應連畫者都不如。<sup>53</sup>

前引普林斯頓大學的無款〈王陽明像〉，卷首有王守仁坐於書桌前書寫的白描小像，左方有人立侍一旁，畫幅後接著三則王陽明寫給其甥鄭邦瑞的尺牘，更之後是王陽明門人黃綰（1477-1551）、蕭敬德等人題跋。姜一涵認為書蹟與圖像分別為兩個時期所作，畫蹟是民國初年收藏家重新裝裱後，延請畫家添繪者。<sup>54</sup>不過起首的白描畫像，並不似出自民初畫家手筆，其風格反而讓人聯想到《王陽明先生圖譜》，兩者均意圖表現王守仁的面容特色，靠椅形式亦均為高背、頂端後卷的樣式，不無可能出自同一位畫家之手。且全卷各紙（此卷畫幅一紙、陽明書幅三紙、題跋三紙）接合處所鈐騎縫印，除葉恭綽（1881-1968）、王南屏（1924-1985）藏印鮮明完整外，不乏經重新裱

52 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卷11，〈贈畫像者蔡少壑序〉，頁4。

53 「像，曲技也，嚮苟非與遊之深，而求之至，習寢食，共几席，朝且夕焉，縷心纒腎，有獨得其神於冠裳容貌之所不及，即何以能圖寫冠裳容貌如是之工工矣。陽明先生之沒，不知其幾十年矣，抑何以肆焉，而手次之若是也。夫像且爾，況吾黨弟子之誦說其道者，苟不篤志而好之，如為像者之求先生焉，其能間竊其似乎哉！而況望其又有出於冠裳容貌之外者哉！嗟乎，予感君之獨能，而特耻君之不如焉。」見茅坤，《茅鹿門先生文集》，卷11，〈贈畫像者蔡少壑序〉，頁5。

54 姜一涵，〈普林斯頓大學美術博物館藏王陽明三札卷〉，《明報月刊》，10：1（香港，1975），頁58-65。



裝而有切損的印蹟，顯為前代藏者之鈐印。畫幅與陽明書幅第一紙的騎縫印中有「青藜館」一印，經查疑為明末著名文士周如砥（1550-1615）藏印，若然，亦可提示該陽明畫像成畫年代必早於周如砥卒年。鄭邦瑞為餘姚人，他所寶藏的此卷，應可視為江南地區流傳之王陽明像之一例。

除了蔡世新以外，也有其他人作王守仁像。江南一帶有文徵明（1470-1559）的門人陸治（1496-1576）及陳洪綬（1599-1652）作陽明像，陸治所作像還被蔡懋德（1586-1644）之子所摹寫，其子提學江西，在吉安時曾夢謁王守仁而叩學，遂在陽明像上加入其父與己之像，意即已侍父共同問道於王守仁。此圖有八大山人（1626-1705）題「侍親問道圖」五字。<sup>55</sup>陳洪綬所作〈陽明先生像〉畫軸（圖八）藏於哈佛大學福格美術館藏，尚未確定其真偽，與現存於貴陽扶風山陽明祠的石刻王陽明畫像（圖九，楊儒賓藏）頗近似，<sup>56</sup>除臉部不類外，姿態、衣摺、衣帶之形狀極相似，此應可代表陳洪綬確曾於當時畫過陽明像。亦為江南地區流傳王陽明像之一例。陸治並不以畫人物聞名，他所繪製的陽明像與本人能有幾分相似，頗令人存疑。陳洪綬則善於以變形方式繪製散發奇古風味的人物，亦非寫實派的畫法。因

<sup>55</sup> 方濬頤，《夢園書畫錄》，收入《歷代書畫錄輯刊》5（北京：中國圖書館出版社，2007），卷17，〈黃匡民侍親問道圖卷〉，頁31-36。

<sup>56</sup> 該石刻所本的畫像似已不存，但光緒年間地方人士將此畫像刻在祠之石上，從畫像到石刻的變化，請見劉宗堯纂，（民國）《遷江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廣西省》第13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頁216-217。此石刻拓本見於張岱編，《陽明先生遺像冊》，收入《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21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中。其中鄭珍的跋文詳細考證該像的來源脈絡。清華大學中文所楊儒賓教授有此石刻全幅的拓本圖像，文字的部份與《陽明先生遺像冊》所錄基本一致，而拓本最前端的陽明像，是《陽明先生遺像冊》所沒有的。本文寫作期間承其慷慨賜寄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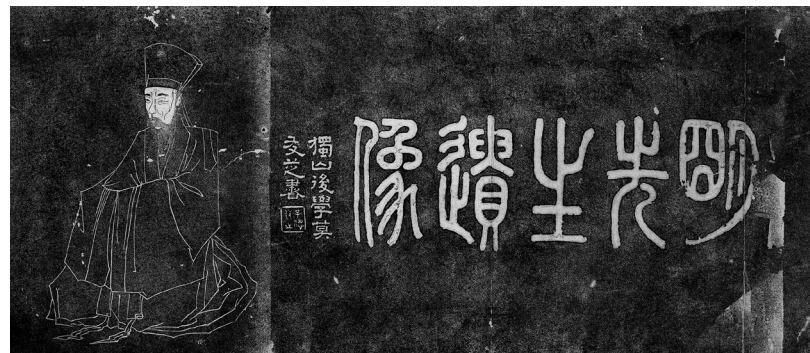
圖八：傳陳洪綬，陽明先生像，Fogg Museum 藏。



圖八局部



圖九局部



圖九：無款，石刻陽明像，楊儒賓藏。

此由江南地區畫家描繪的王陽明像，「存真」或非其要點，創造一個可被接受的「依託」的形象，供其徒眾追念即可。可能是次於寫實本的選擇。

此外如黃兆彪，據載：

黃兆彪畫王文成公像，瘦而長髯露齒，後有徐文貞公跋，皆未從祀時語也。<sup>57</sup>

黃兆彪其人生平不詳，但應是畫師。

我們若是注意一些零散的文字資料，也有不少有關陽明畫像流傳的記載，儘管因資料不夠集中，使我們很難精確分析畫像的來源及流傳的管道，但至少可知王守仁畫像的流行區域。

王守仁的事功多在江西，加上他晚年學術圓熟以後，所傳弟子也多半是江西人，所以推測江西當地應有不少王守仁畫像。如徐階（1503-1583）藉巡按江西時重修南昌仰止祠，肖王守仁像而祠之，所肖似是畫像。立龍沙會，集學校諸生講學於此。<sup>58</sup>據載：

公（徐階）所稱良知學，本故王文成公守仁，而文成於江西最顯著，自公推行之，且像文成而祀焉，其地遂有生像公以祀者。<sup>59</sup>

除了建祠肖像以外，徐階還從士人家中摹王守仁像，分為燕居像與朝衣冠像兩類：

<sup>57</sup> 袁中道，《珂雪齋遊居柿錄》，收入袁中道撰，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下冊，卷2，頁1133。

<sup>58</sup>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35，〈附錄四·年譜附錄一〉，「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條，頁64-65。

<sup>59</sup> 王世貞，〈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存齋徐公行狀〉，《弇州山人續稿》，收入《明人文集叢刊》第一期第22種（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卷136，頁7。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sup>60</sup>

徐階表示呂生所得的燕居像，人覺極似，而「貌殊不武」：

予嘗見人言此像于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尚於其學求之。<sup>61</sup>

這讓人聯想到《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說張良像「狀貌如婦人好女」，所以不能以貌取人的典故。徐階說王守仁以武功顯，但此武功是從其學術發用而來，所以關鍵還在學術而不在武功。學術為體，武功為用，這跟明中期以來的流行觀點是一致的。<sup>62</sup>

江西安福張鰲山（1511年進士）也有陽明畫像。張鰲山是進士出身，在宸濠之變時跟隨王守仁勤王。理學上，他原本師事同鄉李宗柟，得求放心之說，據方志所載，李宗柟「日行功過錄」，以功過錄以求放心。<sup>63</sup>此後張鰲山轉師王守仁，王守仁的學術講究自得，張鰲山頗受啟發，所以在王守仁卒後，繪陽明畫像以自範。鄒守益記述：

<sup>60</sup>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35，〈附錄四·年譜附錄一〉，「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條，頁64。

<sup>61</sup>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35，〈附錄四·年譜附錄一〉，「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條，頁65。

<sup>62</sup> 錢明比對《年譜》與《世經堂集》中的記文內容，發現稍有不同，《世經堂集》說該像是「贈同年淡泉鄭子」，而非《年譜》所說的「贈呂生舒」。錢明推測有可能是兩幅畫分贈鄭、呂二人。見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第9章，〈陽明之遺像——形象考〉，頁155-156。

<sup>63</sup> 姚濬昌等修，周立瀛等纂，（同治）《安福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773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10，〈名臣〉，頁21。

張子鰲山繪陽明先師遺像，及彙書翰爲一卷，夙夜用以自範。某敬題曰：《會稽師訓》。<sup>64</sup>

據「夙夜用以自範」，推測張鰲山可能有敬拜畫像，或與畫像對坐之類的行爲。

王守仁的故鄉浙江一帶也有許多陽明畫像，如明末黃道周（1585-1646）談到，有人從浙江前往福建漳浦任官，便根據從餘姚帶來的陽明畫像作塑像以祠祀之。<sup>65</sup>晚清李慈銘（1830-1894）也指出——「文成公像越中舊家多有傳者」。<sup>66</sup>此外，清初湖北唐建中因遊江南而得畫像，<sup>67</sup>並出示予其友萬承蒼（?-1746），顯示清代江南仍有陽明畫像流傳。

## 四、陽明畫像的作用

### 收藏品題

士人常對畫像有所品題，而對理學家畫像的品題或相關文字，常

<sup>64</sup> 鄒守益著，董平編校整理，《鄒守益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18，〈題會稽師訓卷〉，頁875。

<sup>65</sup> 黃道周，《黃石齋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84冊，卷11，〈王文成公碑〉，頁11：「于時主縣治者爲天台王公，諱立準，蒞任甫數月，舉百廢，以保甲治諸盜有聲；四明施公蒞吾漳八九年矣，……王公既選勝東郊，負郭臨流，爲堂宇甚壯，施公從姚江得文成像，遂貌之。」

<sup>66</sup> 吳慶坻著，張文其、劉德麟點校，《蕉廊脞錄》，頁200。

<sup>67</sup> 萬承蒼，《孺廬先生文錄》，在李祖陶，《國朝文錄續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71冊，〈王陽明先生畫像記〉，頁19-21：「唐君赤子遊江南，得王陽明先生畫像，寶而藏之。辛亥冬，相見於京師，出以授余，俾爲記，余每一展視，輒悚然起敬，凝然若有思，如是者三年，未有以復也。……陽明先生畫像，杭州、南安皆有石刻，此幅作辭闕圖，蓋若有隱痛焉。」

涉及品題者對理學的看法或立場。如華亭董傳策（1550年進士）雖非理學家，但心慕陽明學，並與陽明學者往來，<sup>68</sup>所以他在訪陽明祠當晚，夢王守仁與其論學，夢中王守仁以門人弟子空談爲憂，囑託董傳策予以規勸。<sup>69</sup>董傳策應是在此祠中見到陽明像（不確定是塑像或畫像），於是作詩：

儒門心脈久多岐，大慧慈湖一派師。拈出良知真指竅，向來實證得居夷。雄風自昔開山嶽，髣髴于今肅羽儀。閱世可禁留應跡，誰尋真相破群疑。<sup>70</sup>

強調致良知之說是真指竅，而王守仁謫貶貴州則是致良知的實證地。

又如鄒元標（1551-1624），則是談其致良知說：

登壇濟濟說良知，不著絲毫更數誰。  
拋却語言諸伎倆，日星千古自昭垂。  
羣賢列聖無他語，惟一惟精只此中。  
臘底雪消山盡處，柴門夜夜領春風。  
辛苦平生幾問津，遲回歧路倍傷神。  
于今識得先生面，野草閒花一樣春。  
吾心宇宙有同然，却道金谿是學禪。  
不是先生勤指點，誰令吾道日中天。  
吾鄉先輩盛流傳，疑信相參苦未堅。

<sup>68</sup> 董傳策親近之叔叔董宜陽亦曾從學於鄒守益，可爲當時松江地區受到王學浪潮拍擊之一例。董宜陽與鄒守益事，可參考邱士華，〈許初竹岡阡表介述〉，《故宮文物月刊》，377期（臺北，2014），頁62-71。

<sup>69</sup> 董傳策，《邕欽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2冊，卷6，〈武夷從陽明祠歸，夜夢訪余論學，殊以空談爲憂，若屬余規之云者，寤而賦此以識二首〉，頁10-11。

<sup>70</sup> 董傳策，《邕欽稿》，卷2，〈陽明王先生祠像〉，頁4-5。



踏破草鞋無覓處，始知吾道有真詮。

人疑此道大圓通，規矩方圓妙不窮。

效地法天無兩事，圓神方智總吾宗。<sup>71</sup>

鄒元標的學術偏悟的一邊，但對規矩準繩持之甚嚴，他在仁文書院的會約中提出「修悟雙融」之說。<sup>72</sup>因此前引詩的末一段既說此道大圓通，又說規矩方圓妙不窮，末了以「圓神方智總吾宗」作結。

品題並不限於陽明學者，如湛若水曾應地方官員之請，為陽明畫像題贊，強調其學術上的發明：

逃釋逃黃，匪猖匪狂；為知之良，文武弛張。目其鳳凰，  
鐵其肝腸；聞然其章，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茲非陽明先  
生之相，而中峯大夫程子之藏。<sup>73</sup>

與陽明學對壘的程朱學者也有留下記錄，如張邦奇（1484-1544），與王守仁同時代人，他譏諷王守仁解格物為正物之說是穿鑿附會，<sup>74</sup>所以題其像說：

屹屹乎楞厲，矯矯乎英異。文事武功，震耀斯世。而其志  
則凌跨千古，每欲以道而自知也。惜哉乎沒也，未幾而天  
下以道為諱矣。訾飢渴之飲食，謂夢寐為從父，獨何意  
歟？吾欲起先生於九原，與之反覆辯議，而不可得也，徒

<sup>71</sup> 鄒元標，《願學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4冊，卷1，〈題陽明先生像六首〉，頁40-41。

<sup>72</sup> 鄒元標，《願學集》，卷8，〈仁文會約語〉，頁11-14。

<sup>73</sup>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7冊，卷21，〈廣州程貳守所藏新建伯陽明王先生像贊〉，頁52。

<sup>74</sup> 張邦奇，《張文定公環碧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37冊，卷16，〈陽明先生像贊〉，頁15。

為之瞻遺容而興喟。<sup>75</sup>

此處雖談及王守仁的文事武功，但仍著眼在其學術，張邦奇欲起王守仁於地下與之論辯而不可得，只好對像歎息。

## 與像對坐

除了收藏以外，士人持有這些畫像，往往還有求道與學術上的意義。當時頗流行一些自傳式的遊記或悟道歷程的記載（這讓人很容易聯想起西方的《天路歷程》），這類遊記或悟道歷程，對後學可以起到示範性作用。如鄒守益在王守仁死後，著意編著《王陽明先生圖譜》一書，<sup>76</sup>或錢德洪（1496-1574）等人費心纂述《陽明先生年譜》，都可放在此脈絡下理解。這些大儒在其門人弟子或後學的心中，頗有接近聖人的形象。文字書寫悟道歷程與氣象，而畫像則是這類聖人形象與氣象的直接體現。

畫像可能會被看作真人對待，見畫像時，便彷彿真人臨在而與其對越，可以收到提醒己心的效果。這類與像對坐的傳統，應與《詩經·周頌·清廟》的「對越在天」（即對越上天之意）有關，如楊儒賓教授所指出，對越其實有上天注視監臨之意，而不是人與上天在平等地位的對看。<sup>77</sup>這也正可解釋當時人懸像對坐的行為。懸陽明像對坐者，以王瓊（1459-1532）最著名，不少筆記小說都有記載——

晉溪在本兵，時王文成撫贛，每讀其疏，必稱奇才，平生

<sup>75</sup> 張邦奇，《張文定公環碧堂集》，卷15，〈陽明先生像贊〉，頁15-16。

<sup>76</sup> 鄒守益編著此書意旨，可參考王宗沐的序，見鄒守益編，《王陽明先生圖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43冊，頁1-2。

<sup>77</sup> 楊儒賓，〈《雅》、《頌》與西周儒家的「對越」精神〉，《中國哲學與文化》第11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39-67。

不見先生面，客有進先生像者，公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左手抱孫，右手執先生奏讀之，明日入奏事，必盡行其所請。<sup>78</sup>

王瓊是王守仁的上司，他也許只是把畫像視同真人，而跟王守仁的聖人形象未必有關。但其行被晚明曹于汴（1592年進士）所效法，他亦懸馮應京像與其對坐。<sup>79</sup>馮應京（1555-1606）是盱眙人，學於吉水鄒元標門下，在《明儒學案》被歸類入江右學案。王世貞（1526-1590）之子曾作詩頌揚王、曹二人事：

尚書懸像拜中丞，僕僕生前豈爲名。近見山西曹給事，愛君仿佛似文成。<sup>80</sup>

詩後則註：「王瓊爲大司馬，懸王文成像於署中，日每揖之。安邑曹給事於汴於慕岡亦然。」

也有未曾見過王守仁，但懸像事之的例子，如四川遂寧楊名（1505-1559）。王守仁謫貶貴陽時，受貴州提學副使席書（1461-1527）之邀，講學文明書院，並與席書之間有書信往來，楊名與席書兩家是姻親，所以他幼時便曾讀過王、席二人的通信，此後還與羅洪先（1504-1564）等陽明學者結社講學。楊名應未見過王守仁，但慕其學術，於是懸其像如見其人：

先是吾外舅元山文襄公督學貴陽，王陽明公以部屬劾劉

<sup>78</sup> 姚之駟，《元明事類鈔》，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4冊，卷16，頁24。

<sup>79</sup> 曹于汴曾作〈慕岡先生像贊〉，在《仰節堂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3冊，卷9，頁14。

<sup>80</sup> 錢謙益撰集，許逸民等點校，《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8冊，丁集第六附見王司勳士麒五首，〈贈馮慕岡二首馮時在詔獄〉，頁4469。

瑾，謫龍場驛。文襄聘居文明書院，相與講定性主靜之旨，有書札還往，方洲幼覽之，心解。至是與同第羅念菴洪先、程松溪文德，洎陽明弟子歐陽南塾德、魏水洲良弼、薛中離侃結社講學，雅契夙心，……懸陽明像于壁，羹牆如見。<sup>81</sup>

王守仁以下，其門人弟子也有類似的例子，如習於聶豹（1487-1563）門下的聶有善，便懸其師畫像於靜室，對之端坐省身：

聶有善，雙溪人，晚得聶貞襄主靜宗旨，年四十，命丐者圖其像，上書太極圖說，懸之靜室，終日端坐省身。<sup>82</sup>

## 敬拜祭祀

除了與畫像對坐，還有敬拜祭祀畫像的行爲。祀像的行爲常見於家庭或家族中子女祭祀父母，最著名的即丁蘭刻木事親。丁蘭刻木爲母形，事之如生，「晨昏定省，以盡誠敬」。<sup>83</sup>祭祀畫像應是取法於此類孝行故事而來。如葉思忠便有事像如事生之行，據載其父畫像因屋漏雨受潮，於是他跪伏於像前，直到像乾爲止：

葉思忠，字從本，方基，字本立，俱貴溪諸生，講學於徐波石、甄寒泉之門，共相砥礪，而以致良知爲主，以庸言庸行勿自欺爲工夫。思忠執親喪，廬墓側，至服闋，偶屋

<sup>81</sup> 陳講，〈翰林院編修楊公實卿墓志銘〉，在焦竑編纂，《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卷21，頁106-107。

<sup>82</sup> 王建中等修，劉繹等纂，（同治）《永豐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760號，卷23，〈人物志·處士〉，頁28。

<sup>83</sup> 《孝行錄》（東京：合資會社東京國文社，1922），無作者，無頁碼。

漏雨，濡父像，即懸像跪伏竟日，俟乾乃已。<sup>84</sup>

陽明門人弟子也有祀像的行爲。如永豐劉溢（1521年進士），他遊於羅洪先之門，祀陽明像於家，所祀是畫像或木像不詳：

劉溢，字冕峰，永豐秋江人。……祀王文成像於家，與弟沈同遊吉水羅文恭之門。<sup>85</sup>

太湖李之讓，因學宗良知，於是設陽明像祀之，所祀是畫像或木像亦不詳：

李之讓，字太初，歲貢生，爲桃源教諭，歲旱，民多饑死，縣令猶督逋賦，之讓泣請不聽，遂棄職歸，益精求性命之旨，……其學宗良知，設王陽明先生像祀之，學者稱太初先生。<sup>86</sup>

理學特別講究心性的領悟，尤其心學強調迷悟只在一念之間，所以一些人面謁大儒，因大儒的一句話大悟，便如從地獄脫身般重生，所以師弟子間的關係可以到十分緊密的程度。王畿、錢德洪二人在王守仁卒後，爲其守喪三年，三年喪是父母喪，顯示二人視王守仁爲學術上的父母。羅汝芳（1515-1588）事顏鈞（1504-1596）亦然，鄒元標描寫二人的相處情形是——「夫顏橫離口語，學非有加於先生，而終身事之不衰，生之縲紲，周之貲財，事之有禮，此祖父不能必之孝

<sup>84</sup> 蔣繼洙等修，李樹藩等纂，（同治）《廣信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106號，卷9之3，〈儒林〉，頁43-44。

<sup>85</sup> 王建中等修，劉繹等纂，（同治）《永豐縣志》，卷23，〈人物志·處士〉，頁28。

<sup>86</sup> 符兆鵬等修，趙繼元等纂，（同治）《太湖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安徽省》第10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22，〈人物志三·儒林〉，頁1。

子慈孫，而得之先生。」<sup>87</sup>幾乎跟子女侍奉父母一般無異，小自不敢有違其言，大至終身事奉而無倦色。

羅汝芳卒後，也有門人弟子敬拜其像，這可從李至清（萬曆時人）處得到佐證，據載他因湯顯祖（1550-1616）而專程前往南城拜羅汝芳像，羅汝芳是湯顯祖之師：

李至清，號超無，江陰人，初爲諸生，能詩，有奇俠氣，已而爲頭陀，過臨川，湯顯祖奇之。一日，問若士何師何友，更聞天下幾何人？答云：吾師明德夫子，而友達觀，其人皆已朽矣。達觀以俠，故不可以竟行於世。天下悠悠，令人轉思明德耳。遂至盱拜羅明德像，後又去頭陀爲將軍，弓劍之餘，時發憤爲韻語，題曰《問劍》，顯祖爲之序。<sup>88</sup>

至於羅汝芳的傳人楊起元（1547-1599）不僅敬拜其師像而已，而且「出入必以其像供養，有事必告而後行」。與此相似的還有周汝登（1547-1629）的故事：

（周汝登）已見近溪，七日無所啓請，偶問「如何是擇善固執」？近溪曰：「擇了這善而固執之者也。」從此便有悟入。近溪嘗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覽一二頁，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悚然若鞭背。故先生供近溪像，節日必祭，事之終身。<sup>89</sup>

<sup>87</sup> 鄒元標，《願學集》，卷6上，〈明大中大夫雲南參政近溪羅先生墓碑〉，頁51。

<sup>88</sup> 李人鏡修，梅體萱纂，（同治）《南城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55-56，卷8之8，〈流寓〉，頁13-14。

<sup>89</sup> 黃宗義撰，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36，〈泰州學案五·尚寶周海

也是供奉羅汝芳像，終身奉祀。<sup>90</sup>黃宗羲（1610-1695）對此評論是：

自科舉之學興而師道亡矣，今老師門生之名徧於天下，豈無師哉，由於爲師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師者，非復古人之萬一矣，猶可謂之師哉！<sup>91</sup>

則是著眼在師弟關係上，而其理想的師弟關係幾乎等同於父子關係。顧憲成（1550-1612）的評論頗有意思：

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sup>92</sup>

顯示這類學術上父母的角色跟聖人形象有關。

當時與陽明心學抗衡的江門心學，也有陳獻章像或湛若水像的製作與流傳。湛若水常建書院以奉祀其師，而湛若水的弟子仿而效之，所以二人像都被置於書院等公共空間。如龐嵩（1534年舉人），廣東南海人，他早年習於王守仁門下，晚年歸鄉從湛若水遊，聞隨處體認天理之說，感歎幾虛此生，<sup>93</sup>而龐嵩所至之處皆建書院以奉其師：

易菴在南海之弼唐，弼唐者，龐振卿先生所居之鄉也，……他所至，則爲一書院以奉甘泉，而甘泉平生所至，亦

門先生汝登》，頁854。

90 方祖猷曾檢查周汝登的《東越證學錄》以及其他相關記載，主張周汝登應算是王畿的門人，受羅汝芳的影響相對較小。因此這段記載很可能是後人在抄錄中把楊起元傳誤移到周汝登傳中。方祖猷，《王畿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425-426。

91 黃宗羲，《南雷文定三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2，〈廣師說〉，頁44。

92 黃宗羲撰，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34，〈泰州學案三·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頁806。

93 瑞麟等修，史澄等纂，（光緒）《廣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廣東省》第1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卷116，〈列傳五〉，頁28-31。

輒爲書院以奉白沙，二先生者，皆可謂能尊其師者也。<sup>94</sup>

此處所言的奉白沙、甘泉，除了興建書院以外，應也包括崇祀其像，所崇祀的可能是畫像或塑像，所以龐嵩有〈瞻甘泉遺像詩〉曰：「精華日月在顙首，兩耳之旁南北斗。」<sup>95</sup>門人後學如史桂芳（1518-1598）也有像而受人尊崇，據載江西萬年縣的蔡毅中，年少受教於史桂芳，史桂芳學宗陳獻章。日後蔡毅中因事過其所居地時，「亟訪師第宅，瞻拜遺像；立傳賦詩，以敘懇誠」。<sup>96</sup>

懸像於私室者，則有廣東區準高懸白沙像的例子：

區準高，字德園，……穎悟博學，年十五補入邑庠，十七食餼，試輒高等，一時名噪諸生，……生平有器識，善議論，黜浮華，務爲有用之學，齋頭常懸陳白沙小影，嚴師事之。及病，猶賦詩見志，專以無欲爲卻病奇方，其潛心理學，雖死不懈如此。<sup>97</sup>

至於把陳獻章像當作父母像一般敬拜祭祀，則以賀欽（1437-1510）的故事最爲人所熟知。賀欽是浙江定海人，他與陳獻章相識於北京，聞其學後拜師稱弟子，在辭官歸鄉後，賀欽便懸師像於別室，出告反面——

賀欽時爲給事中，聞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卽我用，而我奚以爲用。謁白沙執弟子禮，卽日抗

94 屈大均，《翁山文外》，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19冊，卷2，〈過易菴贈龐祖如序〉，頁203。

95 瑞麟等修，史澄等纂，（光緒）《廣州府志》，卷161，〈雜錄二〉，頁8。

96 項珂、劉馥桂等修，（同治）《萬年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江西省》第258號，卷9，〈藝文志總論〉，頁21。

97 陶兆麟修，蔡逢思纂，（光緒）《高明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廣東省》第186號，卷13，〈列傳二〉，頁41。



疏，解官還家，肖白沙像懸于別室，出告反面。<sup>98</sup>

賀欽的行爲已不單純是祭祀先賢或崇禮師尊而已，而是把陳獻章當作父母一般看待。另有資料記載，賀欽曾率家中子弟敬拜畫像。<sup>99</sup>南海陳庸（1474年舉人）也有拜像之舉，載於《雜閩源流錄》：

陳庸，字秉常，廣東南海人，力行好古，舉成化甲午，聞江門之學往師事之，白沙深取其德量，……病革，沐浴更衣，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sup>100</sup>

此處僅記陳庸卒前設陳獻章像，焚香再拜而逝，但推測平日應已有此像，否則卒前從何處得來？既有此像，平日可能也有焚香祭祀之舉。即使江門心學已衰的萬曆年間，仍有安福陽明學者劉元卿的族人劉燾（1538年進士），他與陽明學者講學，又嚮慕陳獻章之學，於是前往陳獻章的故鄉，三造其廬，並仿作其遺像，持像歸家崇祀：

劉燾，層巖人，性端重樸，雅慕白沙之學，三造其廬，歸仿其遺像祀之，與劉元卿暨諸弟講學。<sup>101</sup>

這類供養祭祀其師畫像的作法，讓人很容易聯想到禪宗的祖師像。<sup>102</sup>相關研究指出，儒家的圖像常受到佛、道教圖像傳統的影響，

<sup>98</sup> 孫奇逢，《理學宗傳》，收入《孔子文化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卷20，〈陳白沙公獻章〉，頁27-28。

<sup>99</sup>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82冊，馬集4，〈重刻醫閣賀先生稿序〉，頁66。

<sup>100</sup> 張夏，《雜閩源流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3冊，卷14，〈陳庸〉，頁10-11。

<sup>101</sup> 姚濬昌等修，周立瀛等纂，（同治）《安福縣志》，卷11，〈人物志·儒林〉，頁19。

<sup>102</sup> 有關頂相一辭的理解的變化，可參考長岡龍作編，《講座日本美術史》第4卷《造形の場》（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第2章「造形と個別の磁場」，頁125-150。

如《孔子聖蹟圖》便是一例。<sup>103</sup>早在隋唐時代，前往中國求法的日僧常隨身攜帶中國製的高僧畫像回國，儘管各宗派皆有類似作法，不限於禪宗，但禪宗講究不立文字，以心傳心，所以日本禪僧除了攜帶歷史上的祖師像以外，所師從的中國禪師的像更是必攜之物，這是禪僧給予弟子，作為法脈繼承（印可）的證明。加上禪師的形象常因公案而具體化、複雜化，所以這類畫像也可作為公案的對象，亦即公案的繪畫表現。<sup>104</sup>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類畫像也在祖師忌辰拈香時張掛，<sup>105</sup>所以也有學者認為祖師像是作為儀式用或紀念品的性質而被贈與，後來成為禮拜對象。<sup>106</sup>前述楊、周二人學術與禪學在內容上常常只有一間之隔，加上常與僧人往來，所以雖然缺乏直接的證據證明，但未必沒有可能是受到祖師像的影響。

## 學術宗主所在

畫像還有代表文化傳承或學術宗主的象徵意義，隨其學術傳承或宗主之別，所拜的像便有不同。前引楊廉請郭詔作二程及朱熹像，便

<sup>103</sup> Julia K. Murray,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and Pictorial Biographies of the Sag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5, No.2(May 1996), pp.269-300.

<sup>104</sup> 德永弘道，〈南宋初期の禪宗祖師像について——拙菴德光贊達磨像を中心に〉，《國華》929（東京，1971），頁7-17；930（東京，1971），頁5-22。也可參考相井手誠之輔，〈頂相における像主の表象——見心來復象の場合〉，《仏教芸術》282（九州，2005），頁13-35；李宜蓁，〈入明使節の肖像：妙智院藏《策彥周良像》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sup>105</sup> 萱場まゆみ，〈頂相と掛真——興国寺本法燈国師像からの考察〉，《美術史研究》33（東京，1995），頁93-108。

<sup>106</sup> T. Griffith Foulk and Robert H. Sharf, "On the Ritual Use of Ch'an Portraiture in Medieval China," *Cahiers d'Extreme-Asie*, no.7(1993), pp.149-219.



因其以二程、朱熹為學術宗主，所以楊廉獲像後十分珍視，有意將這幾幅畫像「日日而張之，則日日聖賢在目也；時時而張之，則時時聖賢在目也；豈不足以起後學敬仰之心乎！」<sup>107</sup>相對於此，陽明學者鄒守益在祁門舉行講會時，祁門屬徽州府，當地的程朱學風頗盛，所以鄒守益選擇拜孔子像，應是為避免爭議的選擇，但在陽明心學獨盛的江西安福惜陰會中則改拜先師像——

家立一會，與家考之，鄉立一會，與鄉考之。凡鄉會之日，設先師像於中庭，焚香而拜，以次列坐。<sup>108</sup>

孔子像是先聖像，此處的先師像應即王守仁像，與會者須先焚香拜祭後方才就坐。

學術宗主之別在變局間尤易凸顯。<sup>109</sup>明清之際，許多人將亡國歸罪於理學，尤其是陽明心學更是眾矢之的，於是有人藉由拜畫像確立及宣示其學術宗主。如陳確（1604-1677），他在詩作中指出：

憶昔游山陰，滔滔乘末祀。哲人憂喪亂，不替千秋志。眷言集朋儔，竭蹶三之會。肅肅陽明祠，確時預執事。（原註：癸卯日記：昔歲游山陰，先師時集同人于每月三日，講學陽明祠，確亦撰杖以從，痛今何可得。）皇天忽

<sup>107</sup> 楊廉，《楊文恪公文集》，卷26，〈送清狂山人歸泰和序〉，頁8。

<sup>108</sup>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7，〈惜陰申約〉，頁20。

<sup>109</sup> 明清之際便有士人因亡國之痛而拜聖賢圖像，聖賢圖像儼然成為華夷之辨的文化象徵所在。如楊益介便隱於江西西山冰雪堂，列聖賢圖像，作人社，行禮講學陳祭其中，據載：「（楊）益介字友石，明甲申三月之變，椎心頓足，痛不欲生，作採薇之歌，歌畢，放聲而哭於峯下，構冰雪堂，列聖賢圖像，作人社，引集同志之士，行禮講學陳祭其中。」歐陽桂，《西山志》，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72冊，卷5，「上天峯」，頁17。

崩潰，梁木久顛墜。披圖何儼然，瞻拜時隕涕。呈我辨學書，遑遑不知臯。世士競相非，往復一何亟。古學不可誣，焉能泯同異。竊見兩先生，好辨亦不置。開懷與諸儒，牴牾豈有意。千聖同一心，遐哉俟冥契。<sup>110</sup>

此詩作於康熙2年（1663），「辨學書」應即陳確作於順治11年（1654）的〈大學辨〉。《大學》一書的爭訟，歷宋元明三代不止，尤其在王守仁提出《大學》古本後，使各式各樣的《大學》的改本或解釋層出不窮，即連劉宗周（1578-1645）也曾被豐坊偽作的石經《大學》所惑，<sup>111</sup>陳確因作〈大學辨〉等篇，受人質疑遠離其師劉宗周之學，於是他祭祀王、劉二人畫像，並作詩自摠懷抱。他雖推翻王、劉二人之說，但拜謁畫像之舉則表明他不是站在競爭者或反對者的角色。一如《易經》〈蠱卦〉中的「幹父之蠱」，既是修正，又有繼承的意思。<sup>112</sup>陳確所拜奠的王、劉二人畫像可能出自江南一帶的畫師之手。陳確的族人陳之間在寫給黃宗羲的一封信上說：「吳子昇臨陽明先生像，附使者以往。」<sup>113</sup>《國朝畫識》中著錄徽州畫師吳旭，字子升，善人物寫照，<sup>114</sup>有可能是同一人，亦即吳旭畫王守仁像，陳之間託人送去給黃宗羲。因此王、劉二人畫像很可能出自吳旭之手。

<sup>110</sup> 陳確，《乾初先生遺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0冊，《詩集》，卷3，〈癸卯正月三日設陽明山陰兩先生像拜之，呈性解二篇，感賦一首〉，頁3-4。

<sup>111</sup> 王汎森，〈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豐坊與《大學》石經〉，《新史學》，6：4（臺北，1995），頁1-20。

<sup>112</sup> 與年譜有關的部份，見《陳乾初先生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68冊，卷下，康熙2年條，頁17-18。

<sup>113</sup>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附錄〉，〈陳之間令升來函〉，頁9。

<sup>114</sup> 馮金伯，《國朝畫識》，收入《中國歷代畫史匯編》第4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卷13，頁7。

秦松岱也是一例。秦松岱是無錫人，因讀《傳習錄》有悟，於是構願學齋，作陽明畫像而奉祀之。無錫是晚明東林書院所在，當地學風傾向程朱學，加上明末以來對陽明心學的批評日益增多，所以秦松岱崇祀陽明畫像的行為，等於是宣示己之學術宗主。此後他參與江、浙一帶的講學活動，師事從陝西南下江南的李顥（1627-1705）。李顥文集中記載此事：

燈巖秦子諱松岱，潛心陽明之學，構願學齋，肖像嚴事。

志篤力勤，聞先生講學明倫堂，趨赴拱聽，又會講於東

林，徘徊不忍去。<sup>115</sup>

秦松岱之兄秦松齡（1637-1714）以文辭著名，《道南淵源錄》中的〈秦燈巖先生傳〉即出自秦松齡的玄孫秦瀛（1743-1821）之手。<sup>116</sup>秦松岱所奉祀的畫像有可能一直留存下來，所以乾隆年間秦瀛也有題陽明畫像詩。<sup>117</sup>

清初施閏章（1618-1683）來江西任官，在青原山舉行會講，鄒元標的弟子李元鼎（？-1653）奉持羅洪先與鄒元標兩人的遺像，率領當地士人前往講學，據載：

時守憲愚山施公開講青原，公持鄒忠介、羅文恭兩先生遺

<sup>115</sup> 李顥，《二曲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05冊，卷10，〈南行述〉，頁10。

<sup>116</sup> 鄒鍾泉，《道南淵源錄》，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7冊，卷12，〈秦燈巖先生傳〉，頁23。

<sup>117</sup> 秦瀛並非理學中人，所以他的詩中只是簡單誇讚了王守仁的學術與事功：「宗臣遺像鬢毛蒼，公已騎鯨去帝鄉。慷慨誓師傳贛水，艱危得力憶龍場。制科一代勳名在，學術千秋謗燄張。莫道蚍蜉能撼樹，斯文日月耀精芒。」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64冊，詩集卷11，〈題王文成公遺像〉，頁9。

像，率諸生拜階下，使知所宗，言學則首發明良知良能。<sup>118</sup>

李元鼎，吉水人，天啓2年（1622）進士，入清後官至兵部左侍郎。李元鼎屬於谷平李氏家族，族祖李中是羅洪先的老師，族父李邦華（1574-1644）則是鄒元標的弟子。羅洪先與鄒元標先後在吉水的講學活動，谷平李氏族人都是主要成員。爲了表明當地學術宗主，李元鼎選擇的方式，是率領當地士人，共同奉持羅、鄒二人遺像參與講學。

與學術宗主有關的，還有儒釋合流這個長期糾纏陽明心學，造成兩造間存在既緊張、競爭但又常相交集的現象。如廣東番禺屈大均（1630-1696）在明清之際的動亂後爲了抗衡釋氏，鼓勵地方士人把理學家畫像懸於堂室中以爲師表。前有提及龐嵩往來王守仁、湛若水門下，家中收藏有王、湛及陳獻章畫像，屈大均遂建議龐嵩的曾孫龐祖如（名嘉耄）把三人像加上龐嵩的畫像掛出：

自庚寅變亂以來，吾廣州所有書院皆燬於兵，獨釋氏之宮日新月盛，使吾儒有異教充塞之悲，斯道寂寥之歎，……祖如家中復有白沙、甘泉、陽明與先生（按：龐祖如之父龐易菴）遺像，吾欲祖如嘗懸於易菴之堂，以爲吾人之師表。<sup>119</sup>

但也有一種情形，是雙方因陽明畫像而有交集，如清初吳謙牧（1631-1659）在一封信中談到他受託裝裱陽明畫像，請施博尋覓善手：

<sup>118</sup> 張貞生，《庸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29冊，卷5，〈李少司馬七十序〉，頁16。

<sup>119</sup>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2，〈過易菴贈龐祖如序〉，頁203-204。

又有一事，乃家仲兄前曾奉懇者，有王文成公遺像，乃龍山許氏家藏，託為裝裱，工人不善，致有損壞，欲煩左右於郡中覓一善手別為裝過。<sup>120</sup>

吳謙牧兄弟是劉宗周的學生，而施博的學術取向則在儒佛之間，如他自述：「余孔氏門牆中人，每兼好禪宗家言」，<sup>121</sup>二人因畫像而有共通的交契。

當心學家所講學的書院——尤其是具象徵意義的書院被改為佛寺時，也會觸動一些士人的敏感神經。如羅洪先講學的石蓮洞，因位處僻遠而少見人跡，但當石蓮洞及正學書院被僧人買去改建為佛寺時，便有士人無法接受而試圖阻止，<sup>122</sup>所採取的方式是奉羅洪先木主入屋中正坐。據清初講學石蓮洞的吳雲追述此事：

予讀書洞中，周子懋則侍，懋則即周柳川先生之裔孫，柳川即公之賢弟子。自公（按：羅洪先）後中落，僧買正學書院為佛寺，懋則之嚴君周中丞忠節公，俟其佛寺既成，忽自冠帶鼓樂，送公木主，以柳川先生配，入屋中正坐

<sup>120</sup> 吳謙牧，《吳志仁先生遺稿》（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卷5，〈與施易修〉，無頁碼。此條資料是王汎森老師所提供。

<sup>121</sup> 許三禮，《政學合一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65冊，不分卷，〈丁巳問答〉，頁23。

<sup>122</sup> 石蓮洞是羅洪先的私人書屋，規模不大，因此在萬曆《吉安府志》的〈學校志〉中並未將之列，請見余之禎，王時槐等纂修，（萬曆）《吉安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768號，卷15，〈學校志〉，頁9。至於石蓮洞南後來又築正學書院，並由羅洪先本人親自作記，但其名雖為「書院」，其實仍未達到一般建制化書院的規模，因此連胡直也只稱之為「正學堂」。請見羅洪先，〈正學書院記〉，在周樹槐等纂修，（道光）《吉水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766號，卷31，頁7-9；與胡直，〈念菴先生行狀〉，《衡廬精舍藏稿》，卷23，頁15。

焉。然後責於僧曰：「爾何敢擅買書院乎？」今公木主猶坐洞中，神有所依，中丞之力也。<sup>123</sup>

事件還有後續。羅洪先的裔孫不以木主為足，所以尋訪羅洪先中狀元時的畫像，拜於書齋二年，才又回到石蓮洞中敬拜木主，吳雲續道：

公裔孫為中丞壻，得請公狀元在京，自寫及第謝恩像，朝冠朱衣，象簡黃表，面如滿月，秀目清眉，請至書室，拜禮二年，仍歸於令孫，而後至洞中拜木主焉。<sup>124</sup>

據此可知奉羅洪先木主以阻僧人應有成效，所以石蓮洞中仍奉此木主。另從敘述內容，畫像因可讓人明白觀見相貌，作用與木主仍稍有別。

還有僧人曾對鄒元標的畫像作出評論，據載：

無學，廬陵良家子也，常住西峰寺，……皆以為狂僧也。工詩善書，見鄒南臯畫像，拈筆題曰：「烈著都門，名噪天下。世人見之，謂是仗節死義之臣，無學視之，仍是水田老者。」<sup>125</sup>

鄒元標處在晚明三教合一的風潮下，對二氏並未明顯抵斥，其學偏悟，並跟羅大紘、郭子章（1542-1618）等人共同講學青原山，羅、郭二人的學術都傾向三教合一，所以很容易讓人誤會鄒元標的學術近於禪學。無學的題辭指鄒元標以諫張居正（1525-1582）奪情事聞名天下，但若是除此不論，其實只是一名田邊老者而已。我們若是考慮到

<sup>123</sup> 吳雲，《天門詩文稿》（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不分卷，〈石蓮春〉，無頁碼。

<sup>124</sup> 吳雲，《天門詩文稿》，不分卷，〈石蓮春〉，無頁碼。

<sup>125</sup> 謝旻等修，陶成等纂，（雍正）《江西通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782號，卷104，〈仙釋二〉，頁10。

鄒元標作為陽明學者的背景，而題辭只提其諫奪情事，又指其為田邊老者，而完全不及於其悟道與否，則此恐怕跟儒、釋兩家的競爭有關。

## 五、清代的一些變化

入清以後，陽明學受到不少詬病，一些人或者傾向官方正統的程朱學，或者對理學有所詬病而專志考據，於是對王守仁的態度或所持立場遂有轉變。如以尊程朱學而得意官場的熊賜履（1635-1709）著《閑道錄》，尊朱子而闢陽明，視王守仁為異類。<sup>126</sup>如翁方綱（1733-1818）便從程朱學的角度批判王守仁，他特別作〈姚江學致良知論〉以駁陽明學，說：

幸至今日，經學昌明，學者皆知奉朱子為正路之導，其承姚江之說者，固當化去門戶之見，平心虛衷，以適於經傳之訓義，……考證之學仍皆聖賢之學也，良知之學則無此學也。<sup>127</sup>

翁方綱的這段話主要是在縮合理學與考據學的過程中作篩選，而把陽明學篩出了這個圈子外，但並未到深惡痛絕的程度。翁方綱收藏陽明像，曾為此畫像題辭。<sup>128</sup>清代有部份士人流行在每年蘇軾生日時

<sup>126</sup> 永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97，「《閑道錄》三卷」條，頁825。

<sup>127</sup>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82冊，卷7，〈姚江學致良知論上〉，頁5。

<sup>128</sup> 翁方綱，《復初齋外集》，卷15，〈新建王文成公像，方綱以去年所得公手書春游詩臨於幀，次韻敬題〉，頁1：「北學猶堪一脈尋，像摹自交河王氏，靜中真意儼冠簪。瓣香俎豆交河近，倒影星辰越水深。客坐空慚挂私祝，春游誰解續高吟。暫來合眼蒲團上，又恐疏蕪少定心。」交河王氏

集會慶祝，<sup>129</sup>翁方綱同樣也在蘇軾生日當天，將蘇軾像與黃庭堅、顧仲瑛、沈周、毛奇齡、朱彝尊等共六人像一同祭祀。<sup>130</sup>翁方綱的有趣處在於，他本身既是經學家，卻更推尊文人，而讓幾位經學家都配食於蘇軾之側。<sup>131</sup>

儘管清人對心學頗有批判，但仍持續有製作陽明畫像的例子。當時甚至有人透過扶乩拜王守仁為師，且因王守仁入夢而作其畫像，據說畫像上王守仁「凜凜然有生氣」——

陳春墟名昶，陽湖人，入籍大興，中式順天鄉試，出為浙江知縣，歷署桐鄉、秀水、餘姚諸縣事，皆有惠政。在餘姚時，有仙壇一所，相傳陽明先生嘗降此壇。春墟素不信，為駁詰數事，乩中俱能辨雪，乃大服，請受業為弟子。一日早起，忽見陽明先生現形，修髯偉貌，高冠玉立，而面如削瓜，遂下拜，已不見矣。因手摹一像，凜凜然有生氣。余嘗見之，雖老畫師不及也。<sup>132</sup>

有可能是王蘭生，他是河北交河人，康熙60年（1721）進士，隨李光地習律呂歷算音韻之學。

<sup>129</sup> 如畢沅率領屬吏門生禮拜明人陳洪綬所作的蘇軾小像，見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23，〈雜記上〉，頁611，「蘇東坡生日會」條。

<sup>130</sup> 方濬頤有〈毛西河朱竹垞二先生像小幅〉，應即此祭拜所用像，見《夢園書畫錄》，卷23，頁34-37。

<sup>131</sup> 翁方綱在所題詩的詩題，明白表露說：「是日齋中供山谷、玉山、陽明、石田及毛、朱二先生像，以配東坡生日之筵。山谷像不敢以配意題也。敬題四軸各一詩」，另一首詩的詩題則是——「黃文節公像雖日懸蘇齋，然以配食之例為詩，則不敢也。載軒編修以摹本來，並奉齋中屬賦」，黃文節即黃庭堅。可知王守仁等人是配食於蘇軾之側。翁方綱，《復初齋外集》，詩卷第15，頁14、15。

<sup>132</sup> 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卷6，〈耆舊〉，「春墟叔訥兩明府」



這類名人降乩的事件應不罕見，明清不少士人參與降乩活動，所以類似陳春嘯因降乩入夢而作陽明畫像，不必是清以後才有。但這類事件在清以後似乎更常見於筆記小說間，似也象徵了陽明畫像與理學、聖人形象的脫鉤。

馴至嘉慶、道光年間，由於時局動亂，一些有識之士思考經世之途，曾燠（1759-1830）對陽明畫像的題辭，應可代表清中葉左右一些憂心時勢的官員的立場與態度——不論其理學，而在乎其事功。曾燠是江西南城人，乾隆46年（1781）進士，編有《江西詩徵》，他對宋明理學並無好感，在一首題陸贄從祀孔廟詩末，曾燠坦率明言兩宋理學不如漢唐儒者之見，<sup>133</sup>但他對王守仁卻頗為心儀，曾燠任兩淮鹽政期間，在當地建有題襟館，此館名震大江南北，<sup>134</sup>而館中便收藏有包括王守仁畫像的許多畫像。曾燠兩次為王守仁畫像題辭，在一次的題辭上他說：

不畫麒麟閣，誰圖冰雪顏。一官終嶺表，千祀接尼山。性命空談易，經綸實效艱。知兵儒者事，八輔小人患。漢武輕銜轂，周王縱轍環。……去思縣世代，拜像重悲顏。今日烽常警，官軍甲久還，生申何不再，竊願破天慳。<sup>135</sup>

條，頁167。感謝何淑宜教授提供資料。

<sup>133</sup> 張維屏編撰，陳永正點校，《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卷41，〈曾燠〉，頁1001，〈陸宣公從祀孔廟詩〉附識：「北宋以前無道學之名，自漢至唐，其間忠臣義士直行己意，轟轟烈烈，多有宋以後講學之儒所不能及者。」

<sup>134</sup> 方濬頤，《二知軒文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61冊，卷20，〈儀董軒記〉，頁1-2。

<sup>135</sup> 曾燠，《賞雨茅屋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56冊，卷5，〈敬題王文成公畫像二十四韻〉，頁4。

這首詩因達二十四韻，所以此處引文有所省略，此詩起首先說「性命空談易，經綸實效艱」，顯示所重在經綸而不在性命，引文中間省略的部份，則是引用古人故事講王守仁的諸多事功，最後以「拜像重悲潛」，來反應今日缺乏經綸人才以平定禍亂。在另一次的題辭中，曾燠仍把重點放在緬懷王守仁的事功上：

學在陽明洞裏天，兵銷彭蠡澤中煙。元黃未起東林黨，黑白幾誣北狩年。乍得披圖覘道氣，想從憂國見華顛。重吟紙尾懷歸句，尚為征蠻緬昔賢。（原註：畫像後附公自書〈雨中歸懷〉一律，有「五月南征想伏波」之句。）<sup>136</sup>

看似是王守仁緬懷先賢，其實又暗喻了曾燠懷想王守仁事功之意。

賀長齡（1785-1848）對王守仁學術與事功的注意，應跟他巡撫貴州的經歷有關。賀長齡出身湖南，是嘉慶、道光年間的經世派大臣與學者，曾主持《皇朝經世文編》的編纂工作，「經世文編」顧名思義即收錄一些跟經世有關的文章，而其體例編排則是以「學術」為首，收錄許多理學方面的文章，其次依序是治體、吏政、戶政、禮政、兵政、刑政，顯示賀長齡在經世事務上給了理學一個位置，正如李慈銘所言：「其實當漢學極盛之後，實欲救漢學之偏，以折衷於宋學，……而又欲合洛閩之性理、東萊之文獻、永嘉之經制、夾漈之考索諸學為一。」<sup>137</sup>

賀長齡在道光16年後長達九年的時間擔任貴州巡撫，貴州是王守仁當年被謫地與悟道處，當地扶風山陽明祠有大小兩幅王守仁畫

<sup>136</sup> 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5，〈再題王文成公畫像〉，頁4。

<sup>137</sup> 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縕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集部·總集類〉，「皇朝經世文編」條，頁1205-1206。



像，若據鄭珍（1806-1864）所述，此大小兩幅像，大幅即侯服側面大像，幅高六七尺許，上書封新建侯敕；小像是燕坐小像冊，應類似前述吳慶坻所見的燕居授書小像，王守仁裔孫所藏，先後經唐鑑（1778-1861）、賀長齡之手，最後入扶風山陽明祠中。<sup>138</sup>賀長齡及其友人戴熙（1805-1860）、何紹基（1800-1874）等都會為陽明畫像題辭，把陽明畫像跟理學及經世的傾向被緊密聯繫在一起。<sup>139</sup>

相對於曾燠與賀長齡重視事功，也有人從考據學轉向兩宋理學。如何紹基之父何凌漢（1772-1840），他在提學浙江時，便曾積極尋訪黃宗羲始編，全祖望續編而成的《宋元學案》，顯示他對兩宋學術的關注。<sup>140</sup>他還懸掛兩宋理學家的畫像於家中，朝夕瞻仰，據載：

（何凌漢）居恆莊敬刻厲，無欹坐，無疾趨，獨坐必斂容。

急遽時作字，必裁劃正坐而後書。畫鄭君及周子、二程

子、張子、朱子像懸齋壁，昕夕瞻仰。家範嚴肅稱於時。<sup>141</sup>

何凌漢的作法凸顯他所傾心的是兩宋理學，所以他選擇掛的是北宋五子中除邵雍外的其他四人像，另加上朱熹像。文中「鄭君」不確定是否指鄭玄，若是，則顯示他並未把考據學與理學對立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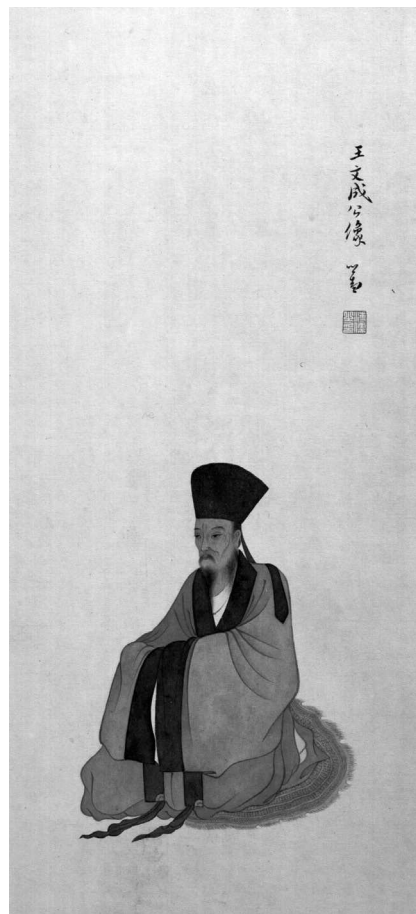
<sup>138</sup> 張岱編，《陽明先生遺像冊》，頁277。

<sup>139</sup> 賀長齡，《耐菴詩文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50冊，詩存卷3，〈題陽明先生像有引〉，頁17-18；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04冊，卷10，〈中丞丈人見示陽明先生遺像敬賦書後〉，頁8；朱履，〈題賀中丞藏王文成公畫像〉，見孫雄輯，《道咸同光四朝詩史》，收入《歷代詩史長編》第18種（臺北：鼎文書局，1971），甲集卷1，頁54。

<sup>140</sup> 相關研究見張藝曦，〈史語所藏《宋儒學案》在清中葉的編纂與流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本3分（臺北，2009），頁451-505。

<sup>141</sup>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第3冊，卷24，〈何文安公事略〉，頁21。

何凌漢之子何紹基不僅曾隨從賀長齡而為陽明畫像題辭，還在北京主持顧祠祭，即崇祀顧炎武的活動，這個活動頗有挑戰當時的考據學的意思。<sup>142</sup>由於顧炎武說過「經學即理學」，所以何紹基對考據學與理學的態度及立場，跟何凌漢差異可能不大。他們雖然反對純粹的考據學，但又未必認為考據學與理學是相悖而不能並立的。何凌漢父子的作為，反映當時學風的轉變與理學的復興。此後直到清末仍不斷有陽明畫像的製作與流傳，以詩書畫三絕著稱的溥心畬（1896-1963），便有〈王文成公像〉（圖十）的畫作傳世，人物形態與陳洪綬所作的相近。今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十：溥心畬，王文成公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sup>142</sup>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本1分（臺北，2008），頁63-93。

## 小結

本文對陽明像的討論涉及兩部份：一是聖人理想的追求與學術宗主，一是士人對像的崇敬或敬拜。講學有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而《傳習錄》等書籍的流傳雖可以讓學術的影響力擴大到更廣的地域，但這類書多半是語錄或一些自傳類的文體，對心學家的悟道過程仍偏重從文字描寫。畫像則可以具體體現理學家的形象，這些形象又跟明人對聖人理想的追求重疊在一起。包括陳獻章、王守仁，以及一些心學家都有畫像流傳，而不少士人收藏這些畫像，或與畫像對越，甚至把畫像當作真人或父母一般敬拜。

儒學與社會中下層人民的關係始終不強，而陽明學可能是儒學中走得最遠的一支。在許多相關記載中，都指出陽明學者的講學活動吸引一些商人、農夫或百姓的聽講，這批庶民很可能會有人供奉或敬拜王守仁及其門人弟子的畫像，但很可惜沒有這方面的資料留存。本文所討論的對象仍限於士人群體，而尚未對塑畫像與庶民的關係作更多的探討。

入清以後，考據學盛起而理學轉衰，作為官方所承認的程朱學仍不乏隨從者，但以陽明學為主的心學則衰退最多，也因此人們對陽明畫像的崇敬之意遠不如明人。但在清中葉理學復興之際，有志理學者除了蒐集理學相關文獻（如《宋元學案》），另一個具象徵意義的行動就是崇祀畫像。何凌漢懸兩宋理學家畫像，及何紹基祀顧炎武，都可看作是新學風將起的先兆，這些像的崇祀或敬拜活動在清中葉以後所起的作用，也許值得我們作更多的觀察。

## Worshipping the Sage The Fabric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Portraits of Wang Yangming in the Ming Dynasty

Yi-xi Zhang

### Abstract

Portraits of Wang Yangming were extremely popular and circulated widely in the hands of local literati and ordinary people from the mid-Ming to the early Qing, when Yangming Learning was popular as well. Local people collected and cherished these portraits, or even worshiped them, regarding them as sage

portraits or portraits of their own scholarly "parent." Such portraits, along with public lectures and pamphlets such as the *Chuanxi lu*, were regarded as the three main ways to contact local people and to spread Yangming Learning.

**Keywords:** Wang yangming; sage portrait; *Chuanxi Lu*; Cai Shixin

## 徵引文獻

- (傳)曾鯨,〈天泉坐月圖〉, Poly Auction 2010/01/23, 拍品 674 號。
- 《孝行錄》, 東京: 合資會社東京國文社, 1922。
- 尹 襄,《巽峰集》,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67 冊, 臺南: 莊嚴文化事業公司, 1997。
- 方祖猷,《王畿評傳》,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 方濬頤,《二知軒文存》, 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661 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夢園書畫錄》, 收入《歷代書畫錄輯刊》5, 北京: 中國圖書館出版社, 2007。
- 王元鼎輯,《年譜》, 收入《王心齋先生全集》, 臺北: 廣文書局, 1979。
- 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 收入《明人文集叢刊》第一期第 22 種, 臺北: 文海出版社, 1970。
- 王守仁,《傳習錄》,《王文成公全書》,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8,《國學基本叢書》本。
- 撰, 吳光等校,《王陽明全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王汎森,〈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豐坊與《大學》石經〉,《新史學》, 6: 4, 臺北, 1995, 頁 1-20。
- ,〈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9 本 1 分, 臺北, 2008, 頁 63-93。
- 王建中等修, 劉繹等纂, (同治)《永豐縣志》, 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 760 號, 臺北: 成文出版社, 1989。
- 王慎中,《玩芳堂摘稿》,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88 冊。
- 包發鸞修, 趙惟仁等纂,《民國南豐縣志》, 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58,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6。
- 永 瑤、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 北京: 中華書局, 1965。
- 朱謀㙔,《畫史會要》, 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6 冊,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 朱 履,〈題賀中丞藏王文成公畫像〉, 見孫雄輯,《道咸同光四朝詩史》, 收入《歷代詩史長編》第 18 種, 臺北: 鼎文書局, 1971。
- 艾南英,《天慵子集》, 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72 冊,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 何紹基,《東洲草堂詩鈔》, 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604 冊。
- 余之禎, 王時槐等纂修, (萬曆)《吉安府志》, 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 768 號。
- 吳 雲,《天門詩文稿》,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 吳慶坻撰, 張文其、劉德麟點校,《蕉廊勝錄》, 北京: 中華書局, 1990。
- 吳謙牧,《吳志仁先生遺稿》,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
- 吳騫編,《陳乾初先生年譜》, 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68 冊,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8。
- 呂妙芬,〈明清儒學關於個體不朽、死後想像、祭祀原理之論述〉, 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主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 臺北, 2012。
- ,〈顏子之傳: 一個為陽明學爭取正統的聲音〉,《漢學研究》, 15: 1, 臺北, 1997, 頁 73-92。
- 宋儀望,《華陽館文集》,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16 冊。
- 宋 濂,《宋學士文集》,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5,《萬有文庫》本。
- 李人鏡修, 梅體萱纂, (同治)《南城縣志》, 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55-56。
-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 臺北: 臺灣中華書局, 1965。
- 李宜蓁,〈入明使節的肖像: 妙智院藏《策彥周良像》之研究〉,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
- 李慈銘著, 由雲龍輯,《越縕堂讀書記》,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0。
- 李 顯,《二曲集》, 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05 冊。
- 周右修, 蔡復午等纂, (嘉慶)《東臺縣志》, 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60, 南京: 鳳凰出版社, 2008。
-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65 冊。
- 屈大均,《翁山文外》, 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9 冊。
- 邱士華,〈許初竹岡阡表介述〉,《故宮文物月刊》, 377 期, 臺北, 2014, 頁 62-71。
- 邵 寶,《容春堂集》續集, 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58 冊。
- 長岡龍作編,《講座日本美術史》第 4 卷《造形の場》,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2005。
- 姚之駟,《元明事類鈔》, 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84 冊。
- 姚濬昌等修, 周立瀛等纂, (同治)《安福縣志》, 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 773 號。
- 姜一涵,〈普林斯頓大學美術博物館藏王陽明三札卷〉,《明報月刊》, 10: 1, 香港, 1975, 頁 58-65。
- 胡 直,《衡廬精舍藏稿》, 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87 冊。



- 茅 坤，《茅鹿門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孫奇逢，《理學宗傳》，收入《孔子文化大全》，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 涂伯昌，《涂子一杯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3冊。
- 秦 瀛，《小峴山人詩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64冊。
-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82冊。
- 耿定向，《耿天臺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1冊，卷13。
- 袁中道，《珂雪齋遊居柿錄》，收入袁中道撰，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下冊。
- 張元忬，〈河南西川尤先生墓誌銘〉，在尤時熙，《擬學小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9冊。
- 張邦奇，《張文定公環碧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37冊。
- 張岱編，《陽明先生遺像冊》，收入《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第21冊，北京：線裝書局，2003。
- 張貞生，《庸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29冊。
- 張 夏，《雒閩源流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23冊。
- 張維屏編撰，陳永正點校，《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
- 張藝曦，〈史語所藏《宋儒學案》在清中葉的編纂與流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本3分，臺北，2009，頁451-505。
- ，〈吉安府價值觀的轉變——以兩本府志為中心的分析〉，在氏著，《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附錄二〉，頁403-432。
- ，〈明中晚期古本《大學》與《傳習錄》的流傳及影響〉，《漢學研究》，24：1，臺北，2006，頁235-268。
- 曹于汴，《仰節堂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3冊。
- 符兆鵬等修，趙繼元等纂，（同治）《太湖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安徽省》第10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許三禮，《政學合一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65冊。
-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82冊。
- 陳 確，《乾初先生遺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0冊。
- 陳 講，〈翰林院編修楊公實卿墓志銘〉，收入焦竑編纂，《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 陶兆麟修，蔡逢思纂，（光緒）《高明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廣東省》第18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 陶望齡，《歇菴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65冊。
- 黃宗義，《南雷文定三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3冊。
- ，〈南雷文定前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3冊。
- 撰，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臺北：里仁書局，1987。
- 黃道周，《黃石齋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84冊。
- 單國強，〈肖像畫類型芻議〉，《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北京，1990，頁11-23。
- 斐大中等修，秦細業等纂，（光緒）《無錫金匱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第21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曾同亨，《泉湖山房稿》，國家圖書館藏內閣文庫影印明刊本。
- 曾 燠，《賞雨茅屋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56冊。
- 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7冊。
- 湯來賀，《內省齋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9冊。
- 程顥、程頤撰，潘富恩導讀，《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華入德，〈明清肖像畫略論〉，《藝術家》，218期，臺北，1993，頁236-245。
- 賀長齡，《耐菴詩文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50冊。
- 項 珂、劉馥桂等修，（同治）《萬年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258號。
- 馮金伯，《國朝畫識》，收入《中國歷代畫史匯編》第4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 楊 廉，《楊文恪公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32冊。
- 楊儒賓，〈《雅》、《頌》與西周儒家的「對越」精神〉，《中國哲學與文化》第11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39-67。
- 瑞麟等修，史澄等纂，（光緒）《廣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廣東省》第1號。
- 萬承蒼，《孺廬先生文錄》，在李祖陶，《國朝文錄續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71冊。
- 董傳策，《邕歛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2冊。
-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34冊。
- 鄒元標，《鄒子存真集》，國家圖書館藏內閣文庫影印明天啓二年序刊本。
- ，〈願學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4冊。
-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5冊。
- 著，董平編校整理，《鄒守益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 編，《王陽明先生圖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43冊。
- 編，《王陽明先生圖譜》，《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四輯第1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鄒德溥，〈伯兄汝海行狀〉，在鄒德涵，《鄒聚所先生外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7冊。
- ，〈鄒泗山先生文集〉，傅斯年圖書館藏安成紹恩堂刊本清刊本。
- 鄒鍾泉，《道南淵源錄》，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7冊。
- 趙榆，〈孫悅漢及其收藏的宣聖及七十二賢贊圖卷〉，《收藏家》，2002年1期，北京，2002，頁49-51。
- 劉元卿，《劉聘君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4冊。
- 劉孔當撰，劉以城編，《劉喜聞先生集》，東京：高橋情報，1993。
- 劉宗堯纂，（民國）《遷江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廣西省》第136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 德永弘道，〈南宋初期の禪宗祖師像について——拙菴德光贊達磨像を中心に〉，《國華》929，東京，1971，頁7-17；930，東京，1971，頁5-22。
- 歐陽桂，《西山志》，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7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潘振泰，〈明代江門心學的崛起與式微〉，《新史學》，7：2，臺北，1996，頁1-46。
- 蔣繼洙等修，李樹藩等纂，（同治）《廣信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106號。
- 鄧麗華，〈從曾鯨肖像畫看晚明文人士個人形象的建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1。
- 鄭振鐸，〈「聖蹟圖」跋〉，收錄於《中國古代版畫叢刊》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390-392。
- 蕭良幹等修，張元忬等纂，（萬曆）《紹興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第520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錢明，《王陽明及其學派論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
- 錢謙益撰集，許逸民等點校，《列朝詩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
- 謝旻等修，陶成等纂，（雍正）《江西通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782號。
- 謝鳴謙輯，《程山謝明學先生年譜》，附於謝文海，《謝程山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9冊。
- 羅大紘，《紫原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39冊。
- 羅洪先，〈正學書院記〉，見周樹槐等纂修，（道光）《吉水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第766號。
- 井手誠之輔，〈頂相における像主の表象——見心來復象の場合〉，《仏教芸術》282，九州，2005，頁13-35。

- 萱場まゆみ，〈頂相と掛真——興國寺本法燈国師像からの考察〉，《美術史研究》33，東京，1995，頁93-108。
- Foult, T. Griffith. and Robert H. Sharf, "On the Ritual Use of Ch'an Portraiture in Medieval China," *Cahiers d'Extreme-Asie*, no.7(1993), pp.149-219.
- Murray, Julia K.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and Pictorial Biographies of the Sag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5, No.2, May 1996, pp.269-300.
- 郭詡，〈文公先生像軸〉，《傳統文化博客資料庫》，<http://www.bjdips.com/gwh/result.aspx?ID=GWH-27449>（2015/09/08）。